

第三章 与将军相处的日子

“平民将军”，永葆朴素本色；体察民情，为民众利益呐喊；热爱学习，一生从始至终；喜爱青年，奖掖官兵争先；教育官兵，民众利益为重；抗日前驱，为民族存正气；献身正义，永作革命斗士。

风雨十年

1920年7月，冯玉祥派人到郑州招兵，说是成立随营学校，招学兵。有个荆迪风（音），也是郑州人，在冯部十六混成旅当排长。我找荆迪风说：“我去。”并到关帝庙求得上上签。签上说：“公侯将相本无种，虽暂困，终必泰。”我始终相信它，决心跟荆迪风上十六混成旅。同时去的共37人，都是学生。到了湖北湛家矶检查身体，有7人未验上。我被编在十六混成旅的补充团第一营第四连。

当时，十六混成旅有四个团：一团团长李鸣钟，二团团长张之江，三团团长张树声，炮团团长鹿钟麟，补充团长张维玺，旅参谋长刘郁芬，参谋刘骥。

冯玉祥曾对士兵讲话说：“你别看我现在当了旅长，我也当过伙夫，当过兵。你们好好干，保国卫民，才能当官。不吃苦中

苦，难得人上人。”他常问我们：“你们的父母是什么人？”大家回答：“是老百姓。”“你们的亲戚朋友是什么人？”答：“是老百姓。”“你们脱了军装不干了是什么人？”答：“是老百姓。”冯又说：“钱跟你爹放在一块，你们不能见了钱就不要爹了。”他常讲孝悌忠信、礼义廉耻。

当时操练很严格，早晨3点钟起来，冬天穿短袄单衣，非跑到出汗不可，长距离跑步，最艰苦了。天冷打雪战，弄得浑身是雪。河水结冰了，赤身到河上，用脚蹬开冰块，下去洗澡，真是刺骨的冷，连长张自忠带着大家苦练。

每天早上操练两个钟头，下午练各种体操、木马、独木桥、跳高、跳远等。学军事知识，不识字的，认600字课。一天不认三个字，不能吃饭。上兵臂上佩一个白布臂章，上写：“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

旅部原有一个模范连，连长是冯治安。11月，又把我们这个连调到旅部，成为模范第二连，还是张自忠当连长。这样，时常跟着冯玉祥，冯不断对我们讲话。

第三团团团长张树声请假不干了，便由补充团张维玺调充。补充团长为刘郁芬，参谋长由刘骥充任。

1920年11月间，十六旅调到信阳，与毅军鲍德全、河南归德府镇守使闹矛盾。吴佩孚支持鲍，要打十六旅。冯把鲍打败了，把鲍1000多人的枪缴了过来。吴佩孚下令给冯：枪要交回去，少一颗螺丝也不行。冯没办法，只得忍气吞声、完完整整地退给他。

在信阳这一阶段，训练特别严格，特别紧张，吃穿更困难。

1921年，吴佩孚命令十六旅去陕西打督军陈树藩。陈有几旅人，吴叫冯一个旅去，想借陈灭冯。冯部到郑州后，两个模范连列队接吴佩孚。吴对我们很客气，拍拍我们的肩膀，笑笑。

冯部到了潼关后便不走了。冯玉祥、刘骥等曾在城楼上开会，我不知其内容。这时训练更紧，纪律极严。如一个姓杨的连长，因调戏妇女，冯决定枪毙他。杨求饶，冯说不行，鹿钟麟、张之江都跪下求情，也不行，杨还是被枪毙了。

约在二三月间，冯部由潼关出发，过灞河，水齐腰，衣服尽湿，又冷。4个团在前面打陈树藩，两个模范连跟旅部在后面。前面张之江指挥，后面是冯本人指挥。我们只听见炮声枪声，不到半天，把陈树藩打跑了，冯带两个连上西安，那时陕西督军是阎相文。

这时冯玉祥的部队改编为十一师，冯是师长，旅长有李鸣钟、张之江等。

那时，陕西杂牌军很多，省长刘镇华有20多个营，胡景翼有4000至5000人，郭坚有1000多人。这些人都向督军阎相文要饷，阎没有办法，喝大烟自杀。阎死，吴佩孚叫冯玉祥当督军。

冯当督军后，两个模范连改为学兵营，张自忠为营长，冯治安升为第一团第一营营长。

这时，冯开始拉拢刘镇华和胡景翼。因郭坚拉拢不了，便想法子收拾他。冯请郭来吃饭，把冯部士兵的“精神书”200多本发给郭的部队，不断和郭见面，尽讲好话，说他不错。一天，冯请郭吃饭，以摔酒杯为号，让手枪队出来把郭抓起来，当场就拉出去枪毙了。冯对郭的部下说，愿干的留下，不愿干的回家。这样收编了一部分郭的部队。

1921年5月，吴佩孚叫冯把督军让给别人，上河南打赵倜。赵是河南督军，有四五十营部队。吴还是要借赵灭冯。

冯部上河南，刘镇华特别高兴。我们离开陕西时，刘部列队欢送我们。冯走后，陕西军政大权由刘独揽。

冯部由陕至豫，一路急行军。冯规定要严守纪律，一定要公买公卖，一草一木、一针一线都不准向老百姓借取。如有不守军纪的，要严办。一路上不准住民房，都搭帐篷露营。到潼关，休整一天，继续向洛阳前进。到陕州有火车，我们没有坐，步行到洛阳。部队由洛阳到郑州，驻在郑州附近，学兵营跟冯玉祥驻在洛阳。郑州附近还有靳云鹗的第八混成旅。冯带了一个手枪队到郑州和靳会面，赵倜知道了，准备晚上收拾冯玉祥，冯闻知后，星夜回到洛阳。到洛阳立即带领学兵营向郑州开拔。坐火车到汜水关，铁轨被扒去一条，修复半小时，继续前进。到了郑州，学兵营住在二里岗老百姓院子里。这时，在郑州以东20多里的地方，冯部与赵倜的部队接火了。赵倜人多，冯部打得很艰苦。一天夜里，冯命令学兵营向前方增援，在火线挖战壕，准备打。一夜无事。拂晓，有人来接防，学兵营回到二里岗休息。大约中午的时候，胡景翼和冯玉祥来到二里岗。靳部第八旅机关枪营长下命令说：现在我们向敌人攻击，正面由冯督军部队担任，右翼由胡景翼担任，左翼由八旅机关枪营担任。命令后，散开，前进，学兵也前进。张自忠不管一切，命令前进，谁不前进，枪毙。双方打得很激烈，我们没有什么进展；胡景翼的队伍上来了，他们枪支很少，见枪如命，六七千人上去空手夺枪，就这样把赵倜打垮了。冯把这些兵集合起来，整顿好，向开封前进。到开封，学兵营驻在“演武厅”，一面学习军事，一面学“精神书”。

三个月后，我到教导团学习，团长是石友三，教育长是张维藩。我被编在第一中队，中队长是高树勋。在教导团，一天操练两个钟头，其余时间学习军事：步兵操典、射击教范、初级战术等。六个月后毕业，我升为司务长，被编在河南第五团第二营第五连。团长门致中，营长吴清旺（音），连长李增志（音）。

当时官兵薪饷，每月只拿到五分之一，司务长5元、排长7

元，连长 71 元，营长 140 元，团长 280 元，旅长 400 元，师长 600 元，特别费 1000 元。冯玉祥送孙良诚钱，一送就是一两万现洋，所以孙感激冯。当时士兵借饷，规定交到我手里，叫“士兵存款”，这是西北军的老规矩；不叫士兵乱花钱，有钱一定要寄回家养父母；绝对做到“烟酒必戒，嫖赌必戒”。这是冯玉祥的规矩。我当司务长，从不喝人茶，抽人烟，兢兢业业，谨慎小心。

1922 年一二月间，冯部开到北京，驻南苑、西苑一带。冯在河南时，成立了五个团，全是少喝没吃的老百姓。五个团长是佟麟阁、门致中、过之纲、葛景章（音）、韩复榘。五个团是冯自己搞的，没有饷，吴佩孚一看，冯几个月就增加了五个团，日子长了，更不得了，制服不了他。因此，把冯部调到北京。当时黎元洪当总统，曹锟为直鲁豫巡阅使，吴佩孚是副使，冯当陆军检阅使，无实权。冯把河南招来的五个团编成三个混成旅：第七旅旅长李鸣钟，第八旅旅长张之江，第二十五旅旅长宋哲元。

我当司务长，还管队伍。天冷，早上跑步，排长不去，我去。干了三个月，升为排长。先在机枪连，后调回二团二营五连。升了官，我更加拼命苦干，不敢出一点错。后来又把我调到学兵团辎重连当排长。石敬亭这时是十一师参谋长。

学兵团长由冯玉祥兼，团副张自忠。后来冯不兼团长，由参谋长石敬亭兼团长。学兵团的训练、学习，比普通团更紧张。排长以上还学英文，由美国留学生教。学军事，学各种技术，严格注意卫生。每星期先检查枪支，有一点脏就要挨打；再检查个人卫生，衣领、口、鼻、指甲都查；再就是查宿舍、厨房、厕所。营长戴白手套摸一摸，有点黑，司务长就要挨打。有一天，我当全团值星官，检查内务时，发现厕所有一只苍蝇，张自忠在全团军官们的面前叫我趴下，用洋镐把我打了五下，打得我几个月不

能起来。我发誓一辈子也不跟张自忠。后来队伍要出发，我被送到第八混成旅医院。

1924年三四月间，冯部出发打张作霖。吴佩孚的计划是：分三路攻东三省。第一路总司令彭寿莘，第二路总司令王怀庆，第三路总司令冯玉祥。第一、二路攻山海关，第三路由古北口经赤峰攻东三省。吴佩孚的阴谋是：一、二路先打下东三省，冯到不了，回头一、二路打冯，消灭冯。冯玉祥看到吴佩孚要收拾他，就联合胡景翼、孙岳成立了国民军。胡、孙各有一万多人，冯是国民军第一军，胡是第二军，孙是第三军。吴佩孚催冯赶快出发，冯老是拖。吴下命令，冯没有办法，只好出发。一天走七八里，十天才走到古北口。我这时病未完全好，张自忠派人叫我上前方去。在前方住了两三天，忽然宣布回北京。一天一夜走了180里，天亮到了北京。老百姓说，天兵到了。学兵团住在旃檀寺，冯把曹錕赶下台，把溥仪赶出故宫，由鹿钟麟经手“逼宫”。溥仪、亲王、宫女等人出来时什么都不准带走。

那时，学兵团和另外两个团在北京维持。一、二、三军向天津、山海关进发，回过头来打吴佩孚，抄吴的后路。吴在天津，冯打天津，各国公使迫吴离开天津，吴只得坐两只兵舰，带七八百人，逃到湖北鸡公山（湖北督军肖耀南原是吴的部下）。吴走后，张作霖进关，与冯推段祺瑞为执政。

当时北京是冯玉祥的势力。鹿钟麟为北京卫戍司令兼一个师长。京兆尹（市长）是刘骥。青海、甘肃、察哈尔、热河、绥远、宁夏、陕西都归西北军。这时是冯玉祥兴旺发达时期。

赶走曹錕后，胡景翼为河南督办，孙岳为河北督办。很快又把孙岳拿掉，提李景林为河北督办。山东督办郑士琦，以后是张宗昌取而代之了。

段祺瑞派王揖唐当安徽督办兼省长，王有顾虑，要冯玉祥派

部队保护他。冯派我带 30 名卫队保护王督南下，冯亲自对我说：“你这次跟王督上安徽，有很大意义。他没有部队，你去，咱的部队向南方发展，你就是告示，好坏全在你。你几十个人就代表西北军，军纪要特别好，全国看着你。”这时冯是西北边防督办。

我当排长，带 30 个人的内卫队保护王揖唐南下。到蚌埠，王下车时，有五个混成旅长去接他。到督办公署后，王对我说：三天以内不见客，你这卫兵特别注意，不准闲人接近。三天以后，王接见了几个旅长，要看看这几个旅的部队。有一天阅兵讲话，王要他们守军纪，听命令。尔后三个旅长向王要三个月的军饷，王发愁，没办法。一天，王到车站接陈树藩，乘机坐车跑到安庆，把我留在蚌埠。当我们决定走时，有一营军队要缴我们的枪。我们开会决定：宁死不交枪，并作好战斗准备。他们的旅长说，你把他们几十个人解决了，冯玉祥派十万大军来，你们谁能打得过。结果，他们不敢缴我们的枪，我们离开蚌埠到了安庆。

王揖唐曾是南北调和的代表。他在安庆的时间很少，时常以安福系首领身份到各省去活动、拉拢，以巩固段执政的地位。他到湖北找督办肖耀南，并去看吴佩孚。吴住鸡公山，王只带我一个人去。他不让吴知道我是西北军的。王说：“你们是死敌。”王、吴谈话时，叫我离开，不让我听。王还到江苏与卢永祥督办联系，到江西和方本仁督办联系，到芜湖与吴金标镇守使联系，为段执政做工作。

约在 1925 年 4 月间，王揖唐上北京，路过郑州时，胡景翼上车与王谈了话。到北京时，卫戍司令鹿钟麟、京兆尹刘骥都去迎接他，很隆重。在北京住了一星期，王上张家口见冯玉祥。冯带张之江、张自忠等团长以上军官都去欢迎。王冯谈话内容，我不清楚。听说是冯跟张作霖有矛盾，张占了天津，还要北京，说是快要打了。一打，南方要起来，吴佩孚要起来，四分五裂，段

执政要完蛋。王督去见冯，大概是为这个。

王又上东北见张作霖，没有叫我跟他去。他去东北，主要是调和东北军与西北军的矛盾。两三天后，他回到北京。刘骥到郑家花园见王时，先到我的住处。刘对我说：“你要好好干，你这几十个人代表西北军，只要跟王督，升官不成问题。”不久王回安庆，以后再没有出去过。

6月间，王又上北京，仍然是去调和冯张的矛盾，没有成功。王给我电报，说他不回安庆了，辞职了，叫我留在安庆。我打电报给冯玉祥，要求归队。冯复电，叫我率队北归。回到张家口，冯又叫我把家眷接去，住在督办署，和李德全住在一起，后来感到不方便，便在外面找房子住下。

一天，冯对我说，在衙门呆了七八个月，吃苦耐劳的作风恐怕丢了，派你几十个人到附近的土山上掏井，一定要掏出水来。挖了一个多月，快有泉了。冯派我到交通兵团当上尉副官。

1925年冬，西北军和东北军打起来了，就在北京与天津之间。第一师第二旅被奉军打垮了，程希贤升任旅长，收容溃退官兵。程派我当旅部手枪队长兼五团二营营副。每天激战，旅长上前线，我始终不离。一天，在廊坊车站，徐树铮的专车经过这里，西北军把徐拉下来就地枪毙。是冯玉祥为陆建章报仇，陆是被徐害死的。

廊坊一带，每天激战，伤亡也很大。冯玉祥本想速战速决，三天把李景林打垮。谁知李很能打，我们打了个把月，一点没有进展。冯下令“总退却”，意思是北京都不要了，守南口。张之江、鹿钟麟一看电报，觉得这样丢人，也对不起冯。他们把“总退却”改为“总攻击”，规定不准放枪，全拿大刀、刺刀拼，分三道战线，前边拼完了，第二道上去，第二道完了，第三道上去，决心死战。一天拂晓前，以大炮为记号，开始攻击，把李景

林打退了，我们向天津方向追。门致中带一个旅在最前面，进入天津市区。对方有三个团长、一个参谋长、一个师长往租界逃，被抓住带到总指挥部。那师长说跟鹿司令熟，要求见面。程希贤去报告鹿钟麟，鹿批了四个字：“准予枭首。”程希贤的号长把他们杀头了。李景林失败后，退到山东。

这次作战，西北军伤亡很大，战后各归原地。

1926年，张宗昌、李景林联合向天津进攻，兵力很强。此时孙岳当河北督办，顶不住，驻北京的西北军全部出动支援。我当副营长，到前线去打。张李两部攻势很猛，西北军只有防御力量，不能进攻。张有一团白俄骑兵，厉害、不怕死。我带一个连加一个排在天津不远的地方守一座大桥，对方多次进攻，被我打退了。白俄骑兵来冲，我们尽力防守，伤亡一半。最后他们用山炮轰，盖沟被掀了，一百几十人只剩下十几个人。我带着队伍，节节抵抗，节节后退，退到一个村子，又支持了几天，便退到北京附近，驻在离南苑一二十里的地方，全部挖沟，准备抵抗。很快，对方打到北京，我们向南口退。我们这个旅直退到察哈尔附近。这时冯玉祥上苏联去了，由张之江代理西北边防督办职务。守南口的总指挥是刘汝明。东北军和吴佩孚的军队攻南口，很猛烈，我们伤亡很大，打了几十天，被东北军打垮了，南口被攻破。张之江见大势已去，离开张家口。队伍纷纷退却，刘汝明在后面收容散兵。“西北票”成废纸。我们第二旅归韩复榘指挥，跟着退到绥远。

西北军退到绥远一带，决定打阎锡山去。韩复榘大概是第三路总指挥，攻大同。锥子山（音）是大同的门户，韩复榘派我这一营去攻，他对我说：“打不下锥子山，我要杀你的头。”山上有三道防线，一道一道被攻破了。全营五六百人，最后只剩下三十余人。韩又给我拨了一部分人。

大同攻不下，就把它围住，抽我们这营去保护口泉煤矿。煤矿监督赵品山跑了，我们在赵的公馆里，缴获了十几个皮箱，我报告了团长，结果给旅长拿去了，也给团长一些，我连一根毛也没捞到。

后来我部又被调去打大同。挖地道，用炸药炸开城墙，一连人冲上去，一个也没有生还。上面又决定还是派兵围住大同，绕过它前进，向山西进攻。晋军抄我们的后路，宋哲元（热河都统）带一个手枪团支援我们，才把晋军打退。忽然又接到命令：总退却。韩复榘的第三路军退到绥远驻防，和晋军接洽，说归他们指挥。晋军要求他们穿山西军服装，“白牌牌”要卸掉，韩复榘都答应了。具体归绥远都统商震指挥，到时要钱，领衣服。

行军路上，我们住老百姓的房子，临走扫地，糊窗时打破了碗，赔人家钱。一针一线不能动。这是冯玉祥的治军办法。冯还派军法官在队伍走后查，查出不按规定办的，给连长撤职处分。

到了洛阳，韩打电话叫我，我骑马到指挥部，韩复榘集合营长以上军官，说我打仗勇敢，是责任以内的事，但用办公费买盘、碗，从中渔利，判处五年徒刑。这是曹福林对我的报复，过去在北京时，我请假回家，当晚没有回营，团长曹福林骂我“混蛋”，我打了他一拳，他一直怀恨在心。现在他当了师长，就来报复我，这是1927年夏天的事。几天后，部队向郑州出发，把我送到洛阳县监牢里，坐了十个月的牢，石敬亭想办法把我放出来。我出来后，上训练总监部高级班，后当步兵一大队四中队中校中队长。在训练总监部受训的有三千多人，主要是各部队挑选的营、连、排长，我那个中队的学员原是连排长，教官是保定毕业的。一次蒋介石来洛阳，到训练总监部讲话，大意是全国要团结起来，同心协力，步调一致，共同对敌，共产党是主要敌人。讲了一两个钟头，我是这次才见到宋美龄的。



1926年冯玉祥访苏路经蒙古库伦与邵力子等合影

左起：陈友仁、邵力子、冯玉祥、鲍罗廷、徐谦

北伐时，孙良诚最卖力，号称铁军，蒋介石为了使冯部里面起矛盾，直接委孙良诚为山东省主席。冯当时是蒋介石的军政部部长，见蒋委任省主席不通过自己，不买蒋的账，不让孙到差，而叫石敬亭去代理。当时训练总监已取消，后来冯才叫孙去当山东主席，这是蒋冯矛盾之一例。

从冯内部说，也不断发生坏事。如郑州国民大队长王长春，曾是石敬亭的学生，因为贪污，被枪毙了。又如，陕西兵工厂督办沈家新（音）因强娶女学生，也被冯枪毙。沈是石敬亭的学生，石去电报保沈，电报未到，沈已处死。这些事例说明冯玉祥执法严，但犯法的人仍不少。

冯玉祥命令将编遣人员收容起来，在郑州设立训练所。训练所长是刘汝明，赵登禹的弟弟赵学礼是大队长，我在赵下面当中队长。

韩复榘当河南省政府主席后，把训练所改编为暂编第一师，师长是过之纲。我当时在这个师的第一旅第一团第一营当营长。那时上甘肃招新兵，到了天水，住一两个月，差不多团长以上的官都弄个姨太太。特务团长赵学礼花 1000 元现洋把一个名叫兰芬的妓女娶来做小老婆。过之纲撤了赵的职，赵带小老婆到潼关，他哥哥赵登禹在潼关一带驻防，有个旅长出缺，赵学礼当了旅长兼潼关警备司令，他逛窑子，叫手枪队把门，谁都不能去。各团各营分到各县招新兵，征来的兵，出几十块钱就可以放回去。过之纲师长发财，团长以上都发财。有个副营长杀了团长，架走营长去当土匪，跑的人到了汉中，张维玺（汉中镇守使）把几十个人抓回来，一律枪毙。

各部把兵招齐了，第一师改名为军，过之纲当了军长，有兵无枪，便派两千人到鹿钟麟那电领枪，只领回四五百支破枪。没有枪，每人发一把大刀。赵学礼被撤职，过之纲派我去接特务团团长，驻天水。

大半是上边知道过之纲在天水弄得不太好，忽有消息说，张自忠带第六师来接防。我当团长不到两个月，过调我为第一旅副旅长。我想恐怕是过认为我是张自忠的人，靠不住，所以把团长拉掉了。张自忠到天水前一两天，过之纲带第一师跑到青海投孙连仲去了。过不叫我跟去，派我负留守处责任。第二天张自忠带两旅人来了，见到我，要我想办法给认识的人打电话，叫他们回来。原来做什么，仍然做什么，保证不拨散。我去联系，一师二旅旅长董泽光（音）带一个团回来了。张自忠把特务团归董节制，成立十八旅，董当旅长，我为副旅长。一方面因我有功，一方面叫我监视他。不久，过之纲又回来了，大概是孙连仲把他的队伍拨散了。过后来奔西安，带着 11 个骡子驮着现洋、金沙，发大洋财了。

过走后，张自忠补充枪支，加紧训练，一个师完整的三个旅，人马齐全。一方面，整顿军纪，还是冯玉祥“不扰民”的办法，跟过之纲不同了；一方面，筹饷，要现洋，筹了几十万款，派一团人护送给鹿钟麟。押运部队走到武功县时，几千老百姓和红枪会打来了，想抢枪，抢接济，打了几个钟头，终于把他们打退了。他们都是老百姓，年景不好，吃的很困难。过了武功县，再没有遇到麻烦，平平安安到了西安。

这时听说冯玉祥由山西回来了，冯阎要联合打蒋介石。当时冯的部队大概有十万人。孙连仲从青海调回来了，高树勋跟孙当师长。青海不要了，后方部队全调上去，准备大战。西北军在平汉线，阎锡山晋军在津浦线。第六师张自忠直达郑州，开到离许昌几十里路的地方。接着，孙连仲、吉鸿昌、孙良诚、方振武、高树勋、鲍刚，都开到平汉线。第六师向许昌进攻。十八旅全是甘肃兵，最顽强、最能打。张自忠下命令：有枪的打枪，没有枪的拿大刀砍，扔手榴弹，不准后退，后退杀头。我是张自忠的人，董泽光让我指挥。第一次，攻下几个村子，打得蒋军节节败退。可是我们伤亡也不小，听说左右友军也打得相当激烈。特务团长刘振三受伤躺下了，张自忠派我去当团长，打到离许昌二里的地方。张自忠决心要把许昌拿下，命令我带特务团进攻附近一个土围子，我带头爬上墙去，半路滑下来，跌伤了腰。我躺在担架上指挥，终于把土围子拿下来了。张自忠把我送到开封总医院去治疗，几个星期后我重返前方，许昌还未打下，张叫我仍去当副旅长。我照样上前线指挥作战。后来，两个旅被蒋军包围了，张派最精锐的十七旅绕到蒋军后面，打不到半天，把包围我们的部队打退了。十七旅伤亡也很大。因为柘城方面吃紧，张又调第六师到柘城那边去，一到就上火线，很激烈，要不是第六师来，蒋军一下就到郑州了。

冯玉祥的总指挥部设在郑州，先住在县政府，蒋介石派飞机来炸，把郑州炸得一塌糊涂。总指挥部搬到了城东北一座高塔附近。前方战斗激烈，伤亡很大，需要补充兵源，张自忠派我回郑州请总司令部想办法。冯玉祥批准由过之纲新兵师拨一团人，过不给，又经司令部黄维纲处长打电话联系，过才拨给一个团，团长叫姚启发（音）。验收时，我按花名册点名，姚对我不满。我用电报向张自忠请示，张叫我把部队停在郑州训练待命。这期间，我经常上冯玉祥那里去。一次，听见冯打电话给郑州十八里河的吉鸿昌，要吉坚决顶住对方进攻，要抽出部队出击，非死守不行。这时大约是1930年七八月间。

不久，听说汪精卫来，说是不打了，停止攻击。主要是阎锡山不打了，不但不打，还要撤兵，冯这边确实是胜利的。事后知道，蒋介石已经打不下去，准备撤退了，再打，蒋非垮不可。就在这个时候，阎不打了，西北军没有办法。阎锡山从津浦路一撤，我们一个也回不了。汪精卫去了以后，我们停止攻击，就在十八里河附近呆着。在此情况下，蒋介石给西北军高级将领送现洋，给委任状，只要投过来就有钱有官，把冯玉祥搞垮了。孙连仲头一个带几个军投蒋了。还有梁冠英、吉鸿昌，六师十七旅王修身也走了，归孙连仲。孙良诚也走了。张自忠没有投，第六师还有两个旅没有投，跟张自忠走，过黄河北去，把姚启发团也带走了。张在过黄河北走前，在郑州想见冯玉祥，没有见着，很泄气。回来路上，他对我说：“嘿，蒋给我二十三路总指挥，30万现洋，我没有接受，坚决要回来跟冯先生。没见着，我带部队过黄河，你是郑州人，留下，看看情况怎样。”当夜张带部队北走了。

郑州一片混乱，不愿投蒋的兵纷纷北逃。快到中秋节了，我还是决定走，追赶部队去。到了黄河大桥，人山人海，都是溃

兵，没有个头。过河往山西方向走，半路遇到一排兵，拦住我，叫我们把东西留下。我说，我是副旅长，奉命收容散兵。经我这一“呼”，他们不敢拦了。我“诈”他们，叫他们不得随便乱来。溃败的队伍，军纪坏到极点，随便拉人家的牲口。我带着四个卫兵，也拉了两匹骡子。走到山西地界，赶上张自忠部队，张自忠叫我回四十八旅当副旅长。

部队到了晋城住下，高树勋师也在附近。不几天，高树勋往南走了，他找孙连仲去了。

张自忠带着队伍——两旅一团在晋城，吃喝都成问题，就开到曲沃。阎锡山不给钱，他们就向老百姓要白面，每人要60斤，除吃三四十斤，多余的卖了买菜吃。这时，冯治安来找张自忠，他们是换帖兄弟，张自忠收容散兵给冯治安编了一个师。曲沃附近这两个师，都是冯玉祥的亲信。

孙良诚跑到天津不干了，他的三个师驻在翼城附近，也很困难，军纪也差。三个师长：张人杰原是张自忠部下，汤传声原是冯治安部下，鲍刚原是方振武部下。张自忠派我去找他们，想把他们拉过来。第一次去，没有成功。张人杰说， he 现在是师长，过来当个旅长，不干。汤传声有点犹豫：去吧，当个旅长，不去，队伍没有张人杰大，怕张吃掉他。第二次又去，鲍刚请我吃饭，张人杰作陪。鲍当面说我去拉他们的队伍，不客气的话，把你抓起来，不但不请你吃饭，还让你到小屋蹲着。这次去，汤传声自动过来投冯治安，这是我的功劳。汤这一师过来了，冯治安把它拨散了，汤做了个师部参议，张人杰更不来了。

宋哲元失败后，人没了，官也没了，穿便衣过黄河，来找张自忠，住在曲沃附近。这时，张学良在北平，北平、天津一带都归张学良。宋哲元派肖振瀛到张学良那里活动以后，我们归了张学良，成立二十九军。张学良派弓富魁点检我们的队伍，点完以

后，说部队要缩编，旅长编为团长，团长为营长，营长为连长，师长不动。缩编以后的二十九军，下有两个师：三十七师、三十八师。每师四个团，每团三个营，每营四个连，每连120人。我原来所在的十八旅编为二二六团，团长是原旅长董泽光，我是第一营营长。

缩编以后，发八成饷，团长120元，营长80元，连长50元，发中国票、交通票，可以兑现，还可以领衣服，待遇好多了。不归张学良，冻也得把我们冻死。

(李九思，刁则纯记录整理)

幕僚所见

我于1926年在冯玉祥将军戎幕充国民军联军总参谋处秘书，曾负责保管来往机密文稿。并曾参加全军军以上参谋长会议，担任记录，又奉命主编《冯总司令训令文稿汇编》，将冯对部下的重要指示选集数百篇订成巨帙，印发全军以资参阅。后来又随冯至南京，先后在编遣委员会和军政部工作，对于冯在北伐一段时期的事迹颇多耳闻目击。兹就记忆所及，作一简要回顾。

草亭密语 驱曹倒吴

冯玉祥原籍安徽巢县，生长在河北保定，家世清寒，出身行伍，历任北洋和国民党政府军政要职，为北洋军阀中的杰出人物；从他所策动的滦州起义，廊坊起义，驱曹倒吴，驱逐溥仪出宫，张垣政变和手摭曹锟宠幸李彦青，怒斥蒋介石亲信刘纪文等一系列事件来看，可以说明他在反帝反封建方面都曾做出贡献。但有些人对他不无微词，千秋功罪历史自有定评，本文只据事直书。

当第一次直奉战后，直系凭战胜声威，曹錕驻节保定，吴佩孚坐镇洛阳，互为声援，并借“猪仔议员”贿选曹錕登上总统宝座。吴佩孚任直鲁豫三省巡阅使，权倾内外，野心勃勃，战争烽火弥漫全国。先是冯玉祥充河南督军，在第一次直奉战争，长辛店一役率部策应，出力甚多。战后吴之亲信张福来继任豫督，冯则充任陆军检阅使，有职无权，与吴貌合神离。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开始前夕，冯的盟兄孙岳由大名镇守使调来拱卫北京，在检阅使署一座草亭之内密商主和之策。既有成约，复联合陕西陆军第一师师长胡景翼暗中布置待机而动。

那时冯部被调赴喜峰口一带与奉军作战，冯仅遣少数斥候队轻装前行，每到一地即以电报报告其行踪，取信曹、吴。并借口修路，把炮火兵力潜伏在沿公路两旁的城镇，不露声色，待吴佩孚嫡系部队第三师开赴山海关前线之后，立即班师回京，由孙部策应入城，包围总统府。胡部得讯亦由前线反戈，会师一处，驱曹倒吴，宣告主和，拥段祺瑞为临时执政，迎孙中山先生北上共商国是，成立国民联军总部。冯被推为联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任第二军军长兼河南军务善后督办，孙岳任第三军军长兼河南省长，在孙未到任以前由何遂代理；以张之江为察哈尔都统，李鸣钟为绥远都统，宋哲元为热河都统，刘郁芬代甘肃督办，鹿钟麟任北京卫戍总司令。冯入京安民布告中首述“兵凶战危古人所戒，国家至不得已而用兵，必求有益于国有益于民，断未有不顾国家之安危不恤人民之涂炭，好战喜斗如今日者，殊不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云云，仅此寥寥数语，却已道出当地人民苦于内战的心情与他们主张和平的动机。自此之后，冯与国民党拉上关系，后来配合北伐军五原誓师，解西安之围，出兵潼关，与国民革命军会师郑、汴，直捣幽燕。“草亭密语”实为其历史转折点。因此冯玉祥对此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非常重视。

1927年驻节开封时曾为纪念此日大征诗文。我曾为秦德纯参谋长代拟七律三首，其中一首诗云：“草亭数语两心明，结合纯然出至诚，从此中原风气变，大河南北起欢声。”盖已道出此一事实的重要意义矣。

整饬内部 严格军纪

冯玉祥对于参谋长的选用非常严格，除非与他一起行伍，才识兼优堪膺斯选者，不讲究学历外，否则非国内外陆军大学出身者不用。所以他的历届参谋长都属于这两种类型。如蒋鸿遇、石敬亭属于老行伍出身类型，刘骥、熊斌、邱山宁、王乃模、曹浩森、秦德纯等都属于陆大出身类型。

冯部久戍西北，人才较缺乏。冯玉祥对于外来投效的知识分子，十分器重，提拔很快。如薛笃弼、薛笃烈、邓哲熙、邓崇熙、郭春涛、何其巩、黄少谷、唐悦良、邓翠英、邓飞黄、戈定远、简又文、凌勉之、孟宪章、王开化、李世军、郑方珩、雷嗣尚、周鸣湘等，后来在政治舞台上都是活跃人物。

冯军总司令部设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总参赞、左右参赞、参赞、总参议、参议、顾问、秘书长、副秘书长、高级秘书、参谋、秘书、副官、军务、军需、军医、军法、民政、机要及抚恤、外事、电政等处。总参谋长初为刘骥，副总参谋长为曹浩森，后刘调任第三十军军长，曹升为总参谋长，以二十三军军长秦德纯调任副总参谋长。后曹调本军训练总监，以第五方面军总指挥石敬亭调任总参谋长。后石又调任山东省政府代主席，秦德纯升充总参谋长，吴锡祺升代副总参谋长，后又易张联升。总参赞蒋鸿遇，左参赞林立，右参赞周煜坤，总参议熊斌，其余参赞、参议甚多，不能一一列举。参谋处长由吴锡祺兼，副处长虞典书兼军务处，秘书长初为何其巩，后易黄少谷，副秘书长戈定

远，副官处处长许襄云，后许调铁路运输司令，以胡长海继，后胡又另调，以张白忠继，仍兼第二集团军军官学校校长；军需处长初为贾玉璋，后为傅正舜；军医处长谢文龙，副处长胡兰生兼后方总医院院长，军法处长徐维烈，民政处长任佑民，机要处长邓翠英，外事处长唐悦良，电政处长郑方珩，抚恤处长武景唐。此外还有总政部，由郭春涛任主任，下设秘书、组织、宣传三处，秘书处长李世军，组织处长简又文，宣传处长孟宪章。

冯部官佐分为三等十二级，一等比将官，二等比校官，三等比尉官。一等一级只冯玉祥一人，其余方面军总指挥、总参谋长、副参谋长和一些资深军长，均为一等二级，部分军长和师长为一等三级，旅长为一等四级；团长为二等一级，营长为二等四级，连长为三等一级，排长为三等二级。总部处长、副处长、科长比照师长旅长团长等级銜叙。将官用红缎胸章缀以黑星，校官用黄缎胸章缀以黑星，尉官用蓝缎胸章缀以黑星。但旅以上副主官如副旅长、副师长、副军长、副总指挥之类，则用红缎胸章缀以白星，使人一目了然。

冯部服装官兵一律，冬夏均是灰色，并绑裹腿，军服上身用窄袖，下身军裤均用中国式，便于前后掉换来穿，可以耐磨一些。冬日帽子多用棉帽后面双层可以放下来护耳护脸，北地苦寒，此种式样正合实用。夏日戴大草帽，附以蓝油布帽罩，既可蔽日又可遮雨，同时蓝色是保护色，行军作战两得其宜。

冯部在北伐时期因西北各省地瘠民贫，维持这一庞大军队食、穿、用三项，已感财力不胜，更谈不上按月发饷，官兵一律每月只发给菜金、服装、鞋袜。菜金每日每人三角，按旬具领，所省下来的钱发给本人，作为零用，其他一些则用于军医疗治，病号饮食公家有照顾。遇有特别用途可打借条，由直属长官批准报销。校官以下不准携眷，带眷者每周有一两天外宿假。所有眷

属用的粮煤得比照本人标准向军需处请领。眷属一般以父母妻子为限，如有老年父母随营奉养，冯玉祥还不时赠与皮袄和肉米，以示优待。遇有重大节日或作战胜利，冯玉祥常给予官兵以现金或实物犒赏。所以大家还不觉得没有薪饷的困难。一直到北伐胜利之后，才按等级发给维持费。冯玉祥对于参谋、军需人员似较重视，常给以肥缺调剂。如刘骥曾充陇海铁路督办，王乃模、杨慕时曾充京汉铁路局局长，龚柏龄曾充京奉铁路局局长，陈琢如曾充津浦铁路局局长，舒双全曾充崇文门税关监督等。但时间都不很长，大家轮流来干，总使多一些收入，生活能过得去，安心为他效力而已。

冯部官兵除佩符号、胸章、识别带之外，军服内外还缀有标语式的印好的小布条，如“打倒帝国主义，瞄不准不放”，“不到二百米以内不放，随便放枪就是懒虫就是反革命”，无论官兵在换洗军服时，必须将标语拆下缀上。冯玉祥时常于检查内务或召见部队长时亲自检查，如未佩带，即受申斥。

冯部行军非常迅速机密。冯玉祥在北伐时期驻节郑州、新乡时，经常命车站上掌握四辆火车头，朝东西南北向升火待用，一声令下，挂好就走。究竟冯何时要走，目的地在何处，他人很难捉摸。一看见他的手枪旅开始拆帐篷，就是要走的迹象。这时没办的事赶快办好，要吃的饭赶快吃饱。有时甚至事未办完，饭未吃好，车已开动，其迅速有如此。

在每次战役开始时，冯玉祥经常废寝忘食披阅电报，研究敌情。时常用电话指挥作战，有时部队已动，命令才下，只是补办手续而已。他的部队经常要做好战斗准备，听候调遣。军令森严，作战非常勇敢，所以能打硬仗。刘镇华部军长梅发魁在豫东作战不力，即被当场枪决，可见一斑。

冯玉祥有时从谏如流，和蔼可亲，有时声色俱厉，拒人千

里。在开封，总部有一位二等一级参谋何成璞系日本陆大毕业，与曹浩森有同学之谊；由曹介绍来参谋处工作，并在禹王台参谋训练班任教官。他时常上条陈，深得冯的嘉纳，将他提升为一等四级高参，他很感冯的知遇。不料有一次他上条陈，提出凡涉及军法案件，应组织军法会审，然后执行，为冯所不能接受，说他信口雌黄，不负责任，授意叫他告退，何不得不走。因受此刺激再东渡扶桑，后来回国在陆大任教颇负声誉。冯看到不惬己意的文电，有时有很奇怪的批语，如：放屁、放狗屁、脱裤子放屁等一类骂语。有一次对蒋介石的亲信，所谓党国元老吴稚晖因话不投机，竟用诸葛亮骂王朗的语调，骂他“苍髯匹夫，皓首老贼……死有何面目见总理于地下！”骂得淋漓尽致，不留余地。

冯蒋关系 由合而分

当国民党宁汉分裂之时，冯玉祥初用两面手法，派刘骥为驻武汉代表，又派熊斌为驻南京代表。尽管宁汉两方都委他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他均不就职，仍以国民军联军总司令自居。后因蒋介石下野，南京军事方面群龙无首，指挥不统一，致为孙传芳部所求而有龙潭战役的发生，南京岌岌不保。后来靠海军之助虽把孙军击退，但仍与何应钦部相持于明光、固镇之间，尚有威胁首都的可能。同时张宗昌、褚玉璞所部直鲁联军曾向陇海线猛攻，前锋逼近开封，给冯很大压力。冯感到有迎蒋返国主持北伐的必要，除分电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痛陈迎蒋复职之必要外，并派张之江、马福祥东渡日本迎蒋回国。彼时蒋正拟与宋美龄结婚，利用宋家的政治影响以图东山再起，得此机会正中下怀，乃即返国。当蒋宋举行婚礼之时，冯遣其夫人李德全前往参加，由秘书长何其巩随往。以此何其巩后来乃得到蒋的垂青，当上北平市首任市长。

自蒋介石东山再起之后，为着整饬军纪继续北伐，枪毙了作战不力的赖世璜、王天培两个将领，把前锋推进至徐州。冯玉祥也就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之职。同时将盘踞在陇海线东段的直鲁联军打垮，并与何应钦所部在徐州会师。蒋、冯两人先前原未谋面，这次蒋乘专车自徐州东来，冯乘专车从兰封（今兰考）往接，两车在野鸡岗相遇才获会晤；并同车回到开封，结拜金兰。当他俩在河南省府礼堂拍照时，冯让蒋居左，说蒋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让冯居左，说冯年长为兄。两人互让不休，后经王铁老转圈拍两张照片，两人互换居左，以表示既讲公谊又讲私情，两人均表同意。自此之后蒋给冯来电就称“焕章大哥”（焕章乃冯别号），冯给蒋去电则称“介石我弟”，在表面上煞是亲热。

在此次蒋、冯会谈中决定了北伐大计。由四个集团军共同出兵分进合围，直捣平津。蒋部第一集团军沿津浦铁路线北进，冯部第二集团军向鲁西先取济宁，再攻济南，然后与第一集团军会师北进，将主攻兵力放在津浦线上。平汉线由第四集团军李宗仁部负责。第三集团军阎锡山部，以一部兵力守住娘子关，并以主力从平绥路大同出击，以攻敌军侧背，预定在1927年秋季攻下平津。当时还约好冯先驻新乡，以欺骗奉军，牵掣其兵力，俟蒋回归南京与阎李两方商妥部署完毕，再以电报通知。冯即移驻兰封开始进攻。

冯、阎两人说来也是换帖兄弟，从冯给阎去电每称“百川仁仲”可以知之。不过他俩以利害冲突貌合神离。当冯坐镇新乡之时，其先锋部队在磁县、邯郸一带集结故作欲动之势，果然张作霖所部奉军被迷惑，误认为将来如果革命军开始进攻，其主力可能放在平汉，这方面必有一场鏖战，当将其精锐王牌部队三、四方面联合军团张学良、韩麟春所部配置在平汉线上。且乘我军未动之前先发制人，先将阎锡山部队打垮。乃围攻涿州把阎部主力

傅作义部队围困城内月有余日，一面分兵猛攻娘子关，使阎部首尾不能相顾。阎感到力不能支，乃派其参谋长朱绶光来新乡向冯请兵救援。冯以无兵可调为辞，仅允派骑兵郑大章所部在阎部侧翼活动，虚张声势，减轻阎军压力，以顾全阎的面子。其实当时冯并不是无兵可调，乃以冯在南口退却之时，阎曾乘人之危命商震将冯部改编不少，不免有介于心，故不愿在此时期代人火中取栗。

当蒋冯在开封商定北伐军事大计之后，蒋回南京部署一切。冯到新乡牵制奉军。迨各方准备完成，李、白率部沿平汉线北进，冯撤出此线移驻兰封，彼时指定第一兵团刘峙部在津浦线大汶口出击猛攻张宗昌、褚玉璞所部直鲁联军。第四兵团贺耀组部挡住徐州、扬山、黄口一线，确保津浦、陇海两路要冲相机出击。冯部第一方面军孙良诚从豫东出发，由鲁西菏泽一带向孙传芳所部五省联军进攻，以马鸿逵军为策应。方振武部向全乡鱼台出击与孙良诚部合力围歼孙传芳部五省联军。兵力部署既定，一声令下，各路奋勇前进。全线战事非常吃紧。不料孙传芳部以贺耀组部第三十三军张克瑶部驻守黄口战斗力非常薄弱，认为有机可乘，如果把黄口占领，可以切断蒋、冯两大军联络，并可直奔徐州，截断刘峙所部后路，使全部趋于崩溃。因此仅留少数兵力守卫济宁，以主力出击攻下黄口车站。贺耀组抵挡不住，急向蒋介石求援，蒋急电冯玉祥抽调一部往援。冯立即派在兰封候命的石友三军星夜驰援。当孙传芳部击溃张克瑶军占领黄口车站正在洋洋得意之时，石友三部业已赶到，乘其立脚未稳，拦腰侧击，打得落花流水，急急败退。中途又被方振武、马鸿逵两部截击，伤亡惨重，溃不成军，甚至连孙传芳的苏浙闽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大印也被马鸿逵部所俘获。当孙传芳部倾巢出击之时，济宁已被孙良诚部乘虚所攻占，这时已回不得。同时张宗昌、褚玉璞又

怪孙传芳不该离开济宁，贸然出击，以致失去犄角之势，影响全盘战局，造成此次惨败。孙传芳感于内外对彼不利，知大势已去，只好把残部交给李宝章、王金珪等统率，自己溜走。褚玉璞为着挽回危局，曾亲到兖州、泰安一带督战。但上气不振，节节败退。蒋介石急电冯玉祥即日前往济南指挥作战。冯在得电后由兰封回到开封稍事摒挡后，即启程赴鲁。在途中得到报告知，孙良诚部已攻占济南车站，贺耀组部已进入济南城内，方振武部已占领济南辛庄。彼时南京方面组织有战地服务团，以蒋作宾为团长，战地参谋团以张之江为团长，均已开到前线。当我军节节进展之时，日本驻济南的××师团害怕革命军势力扩张，影响日本帝国主义在济南既得的利益，正在蠢蠢欲动之时，恰好我政工人员在城门口张贴标语和漫画，日本兵往下撕，我军予以制止，日军乃以护侨为名采取行动，并向战地服务团外交处处长兼山东交涉员蔡公时交涉，一言不合竟将蔡杀害，同时炮轰我军阵地，贺耀组部乃退出城外。蒋介石闻讯亲到离济南20公里的党家庄车站时，冯的专车行至泰安，闻前方有变，原拟折回开封，乃以蒋介石来电话坚邀冯到党家庄商议，遂继续前进。蒋、冯两人在党家庄车站站长室密商对策，决定以孙良诚为山东省政府主席。在孙率部作战未到任以前，调冯部总参谋长石敬亭代理，暂移省会于泰安。冯则移驻河南道口，所部由大名绕过济南，直取德州，进攻平津。并派何成浚为军使，进入济南，与日军师团长交涉，叫他们停止射击，遵循外交途径，由两国政府协商解决。

冯军移驻道口没有好久，就听到张作霖乘专车退回沈阳时，在皇姑屯车站被日本人谋害，遇炸身亡。冯玉祥乍听这个消息还不大相信，后经其驻津秘密代表丁春膏来电证实，真相始明，乃即移驻新乡，听候中央命令。

当北伐军事节节进展之际，冯部孙良诚、韩复榘两方面军都

在最前线。蒋介石为使冯玉祥更加卖力，一鼓攻克平津，曾许下大愿，说鹿钟麟是河北定县人，过去曾当过北京卫戍总司令，韩复榘是河北霸县人，为着驾轻就熟和实现冀人治冀计，如攻下平津，即以鹿钟麟充任平津卫戍总司令，韩复榘充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冯玉祥对此非常高兴，驱军疾进。迨韩复榘部到达南苑之时，蒋即派何成浚秘密北上，暗中活动，利用冯玉祥过去在驱曹倒吴和驱逐溥仪出宫时，曾向北京各大户摊派捐款，触犯了富豪利益，他们听说冯要重来，无不戒惧，由北平绅商出面公推王士珍为首组织治安维持会，欢迎阎而反对冯。蒋即以民意所在为由，以阎锡山任平津卫戍总司令，商震任河北省政府主席，仍以冯的秘书长何其巩任北平市市长，自食前言。按北伐收复平津战役，冯部出力最多，阎部出力较少，而论功行赏，适得其反，使冯对蒋大大不满。于是乃称病请假赴辉县百泉疗养。

那时蒋约定四位总司令在北平会面，蒋、阎、李三位已到，冯则迟迟不行。南京方面已知此中原委，敦嘱张之江、马福祥一再电促驾，冯才勉强成行。初起程时以泰山号铁甲车压道，过了保定，冯的专车先行，反叫铁甲车殿后。本列车原挂有花车一辆供冯乘坐，但冯将花车分配给参谋处乘用，自己坐在由巩县兵工厂加装钢板的铁篷车上，车至丰台时，冯令转向西直门车站驶去。因此集中在北平西车站迎冯的人们闻讯较迟，都扑了空。至冯的专车到西直门车站停车以后，欢迎人们才蜂拥而至。他们为冯玉祥选定颐和园为行辕，冯不去，令随行官兵仍留住专车之上，本人率一些卫队和随从人员到西山白云寺孙中山灵前伴灵。他的行动神出鬼没，与众不同，令人捉摸不定。阎锡山时任平津卫戍总司令，阎部张荫梧任北平警备司令，晚间城禁森严。虽然冯的专车停在西直门车站，但入晚10时城门紧闭，停止出人，非有上级命令不得开城。可见彼此勾心斗角，尔虞我诈。

冯玉祥到北平的当天晚上，蒋介石以四位集团军总司令均已到齐，即举行一盛大欢迎大宴会，尽情欢叙。冯即席大发议论，大意说“北伐用了这样长的时间，动员这样大的力量，现平津虽告克复，而东北问题尚未解决，军国大计急待筹商，国人所寄望于我们者至为殷切，岂仅为此谋耶”。蒋为之动容。并提议四个总司令和其他重要人员，翌日在汤山开会磋商一切。决议东北问题改用和平解决，目前先以裁军入手，与民休养生息。约定在一个月以后，各总司令集会南京，会商编遣大计。但决议尽管决议，而沿平汉、平津两铁路干线各站仍有不少部队在大招新兵，培养个人势力。冯玉祥对此深表愤慨，命参谋秘书两处和平、津、保、石各地报纸中收集此类招兵消息的材料，加以整理，以便在将来编遣会议时提出纠正。

冯玉祥在到平之日，即面饬参谋秘书副官各处着手筹备在南口旧战场开一大规模的追悼会，以追悼在此战役阵亡的将士。经过积极筹备，该会果即开成。是日蒋介石、李宗仁和海军总司令杨树庄代表陈绍宽等均亲临参加。冯玉祥自称以阵亡将士的孝男身份，向各位长官来宾道谢，并作沉痛的追述和演讲。有不少当年曾经参加此一战役生还的官兵，感动至于泣下。

冯玉祥到平停留不及十天，即回开封，且不作去南京的准备，而以轻装简从，跑到西安去巡视。蒋介石知道他在华北军政要职人事安排上曾厚阎而薄冯，引起冯的不满。而冯部兵员人数最多，实力雄厚，裁兵问题如得不到冯的合作，很难收到良好的效果。必须挟冯以自重，如冯来则阎不敢不来，李更不成问题。乃以军政部部长一席为饵，让冯的挚友马福祥、驻京代表张之江，送电促贺，冯始成行。迨冯到南京之后，蒋即分电阎、李促其来京。他们虽各怀私意，但均不敢不来。阎原定由铁道乘车南下，开封方面闻讯已筹备欢迎。而阎鉴于徐树铮过去覆辙，忽临

时变卦，从天津乘外国轮船到上海，转京沪路到南京。从这里可以看出冯、阎之间内在矛盾。

蒋介石既以冯玉祥充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部长之后，又恐冷淡了阎锡山，乃决定将冯系薛笃弼所担任的内政部部长一席让给阎锡山接充。另设一卫生部以安置薛笃弼，使冯阎两方均感满意。

冯玉祥即就军政部部长之职。军政部规模甚大，设陆军、海军、航空、兵工、军需五署和总务所。部内组成人员除海军署署长由陈绍宽充任自行组织外，余采取中央与冯部各半为原则，参杂少数他系人员。政务次长张群兼兵工署署长（蒋系）、常务次长鹿钟麟（冯系），总务所所长虞典书（冯系）、主任参事马晓军（桂系），陆军署署长曹浩森（冯系）、副署长项雄霄（蒋系），航空署署长熊斌（冯系）、副署长张静愚（蒋系），兵工署副署长徐庭绥（冯系），军需署署长俞飞鹏（蒋系）、副署长贾玉璋（冯系）。后来张群调充上海市市长，所遗的政务次长兼兵工署署长一职由陈仪接充（蒋系）。

冯玉祥对于调京供职人员选择甚严，并且采取降一级任用为标准，非有正式学历和能力较强，鲜能当选，因此使行伍出身者感到不平。韩复榘曾电冯大发牢骚，自请解甲归田，将兵权交与石友三（韩、石私交甚厚，石在西北军中资格与韩相埒，因在南口退却之时，石曾受商震改编，冯对石不满，不肯再重用石，当石敬亭调总参谋长之时，遗下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韩曾力保石友三，冯未准，遂委了张维玺）。冯得韩电后极为不安，乃向中央建议将河南省政府改组（原由冯担任主席，在冯公出期间由民政厅厅长邓哲熙代理），调韩复榘为河南省政府主席并将其兵权卸去，当经行政院会议通过。冯玉祥并亲书一长函用珂罗版复印多份，向校官以上官佐，每人送给一份，以示慰问，而安众心。

后来由于蒋介石的收买，韩、石联合叛冯，在此时已露端倪。

蒋介石在冯玉祥未到南京之前，只恐他不来，用种种手腕要他来。既来之后，即联冯以对付阎、李，迨阎、李都到南京，又联阎、李以对付冯玉祥，在编遣会议上对冯施加压力。

国军编遣委员会由蒋介石任委员长，中央党部代表吴敬恒，国府代表谭延闿，行政院代表宋子文和各将领杨树庄、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何应钦、朱培德等为常务委员，下设总务、编组、遣置、经理四部。总务部主任李济深、副主任葛敬恩，编组部主任李宗仁、副主任张华辅，遣置部主任冯玉祥、副主任刘骥，经理部主任阎锡山、副主任朱绶光。当时蒋提出全国共编 50 个师的指标，交大家讨论。冯对于编遣标准首先提出这样意见，那就是：“强壮者编，老弱者遣，有枪者编，无枪者遣，训练优者编，训练差者遣，战绩优者编，战绩差者遣。”并主张各集团军部队混合来编，不必拘泥那一区域，编遣后军权归中央统一掌握，各集团军总司令均到中央供职，加强中央领导，以改变以往割据的局面。但蒋、阎、李认为各集团军取消之后，所有部队均应归军政部直接节制，冯是军政部部长，那么冯的权力太大；而且他的野心不小，又很有一套权术；善于带兵将，很容易把别人部队拉了过去。蒋、阎、李各怀鬼胎，抓住兵权不放。因而在会议场中形成两种意见。一种主张不分畛域，但照军队素质，训练程度，战绩表现为取舍标准，混合来编。一种主张我国幅员辽阔，南北语言、生活习惯和信仰有所不同，未便强为合编。双方各执一理，无法取得一致。冯后来又提出一个方案，即第一，第二两个集团军原来兵员较多，各编 12 个师，第三、第四两个集团军各编 8 个师，其不属各集团军的各省杂牌军队共编 10 个师，以符合全国 50 个师的指标。同时冯自以为他和蒋拉得很紧，以蒋冯的联合兵力可以控制一切，必能得到蒋的支持。其实这是冯

的天真想法，他就没有想到蒋对他早有戒心，绝不愿冯的力量能和他分庭抗礼。倒是阎锡山看穿这一着，提出另一个方案，那就是第一、二、三、四集团军各编 11 个师，另设一个中央编遣区，也编 11 个师。所设中央编遣区也归蒋掌握。这个方案表面上是抬蒋压冯，拆散蒋冯合作关系，而实际上也便宜了阎自己，同时又讨好了李宗仁，很快就得到蒋介石、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等同意，并顺利通过。按当时冯部共有 9 个方面军，第一方面军孙良诚，第二方面军孙连仲，第三方面军韩复榘，第四方面军宋哲元，第五方面军张维玺，第六方面军刘郁芬，第七方面军方振武，第八方面刘镇华，第九方面军鹿钟麟。每一方面军辖三个军，军辖三个师。此外还有不辖于各方面军的直属军、师、特种兵师和民团军等。兵员实数不下四五十万人，就按 12 个师改编所裁已多，若再改为 11 个师，要裁的数目更多。而中央和第一编遣区归蒋掌握的就现有部队还不足编 22 师，阎、李两部也是如此，无怪他们在平津克复之后还大招新兵增加自己的实力。冯至此已知为他们所抵制，孤掌难鸣，因而托病不再出席。一面急电后方速将编余部队改编为各种警察和保安团队，以保存实力。蒋看冯态度暧昧，称病不出，虑有异志，借口北方局势未稳，让阎先返北平坐镇。这使冯更为恼火，乘蒋因事赴沪之际，留书向谭延闿院长请假，回转开封。编遣会议遂陷于停顿状态。

编遣不成，内战随起，首由桂系发难。先从罢免非本己系统的湖南主席鲁涤平人手，企图把湖南、湖北与广西联成一片，进可以战，退可以守。桂系曾派代表温乔生与冯联络共同倒蒋，已承允诺，并由陶钧、胡宗铎在武汉开始行动。蒋闻讯急亲率精锐部队由海军第二舰队掩护，溯江西上，直取武汉。并令鲁涤平所部从湖南、江西一路出击，切断陶、胡两部与广西方面联络。同时派贺耀组为代表面请冯玉祥出兵相助，事后当以武汉相谢。冯

采取两面手法，派韩复榘率强大兵力进驻信阳，挡住武胜关口，按兵不动，坐观鹬蚌争持，待收渔翁之利。陶、胡因蒋军节节进逼，感于势孤力弱，无法负隅，又兼李明瑞倒戈，使桂系倒蒋运动很快就告失败。西征胜利结束之后，冯欲在武汉方面分得一窝，蒋认为冯之出兵并无助己诚意，因而未与，仅允在山东日本问题获得解决后，将青岛交冯。冯只好耐心等待。

蒋乘战胜桂系声威，认为无人再敢与他抗衡。重编遣旧调，因有编遣实施会议的召集。当时曾派出许多点验组分赴各部队实地点验，以为裁编标准。先是冯回西北之后，军政部长等于虚悬，此时改由鹿钟麟升任。至冯原兼的编遣会遣置部主任一职，此时也由李鸣钟接充。贺国光继刘骥为遣置部副主任。周亚卫继张华铺、葛敬恩身兼编组、总务两部副主任，使编遣会内部人事先获健全，便于推动工作。

日军自五三惨案强占济南、青岛、辽东一带之后，鉴于平津克复，蒋介石政权日趋巩固，此问题未便长拖不决，已有归还之意。只以蒋虑青岛收回之后，势不能不交给冯玉祥，这样使冯得一海口，可以向国外输入军火，不啻为虎添翼。因此蒋宁可青岛收回问题暂搁一边不谈。此刻迫于当地民众要求，全国舆论压力，和国际声誉关系，势难迁延不决。乃捏造口实说日人批评冯部军纪不好，不让孙良诚出兵接收青岛，而任命葛敬恩为青岛市市长，派宪兵司令吴思豫率宪兵队前往接收。冯玉祥怒不可遏，乃命孙良诚自山东撤兵，并令韩复榘、石友三等部均退入陕西，据守关内，准备与蒋决裂。但韩、石原对冯不满，同时又贪恋中原财富，不愿再到陕、甘贫瘠之区受苦，因而受蒋收买，在撤退途中叛变，与冯分道扬镳。后来冯、阎、李与汪精卫等合作，在北平召开国民扩大会议，联合反蒋，引起中原大战，这是后话。

(石仁麟)

麾下十一年

1913年，我在北京近郊平则门外，以一个普通学生的身份投到当时的京卫军第二营管带（营长）冯玉祥部下，开始了我的军旅生活。

从1913年（民国二年）起到1924年（民国十三年）止，整整11个年头，我始终在冯的麾下。11年中，从他当管带，我当他的中哨三棚（班）亲兵开始，直到他当旅长以前，我都是他的亲兵，不离左右。从他当旅长直到做国民军第三军总司令，我也随之成为排、连、营长等中下级军官，最后的职务是第二十五旅一团一营营长，虽然不像当亲兵时左右不离，但也一直在冯最嫡系的部队中工作，经常见面。

关于冯玉祥，数十年来有关他的记述已经很多了。在军阀混战时期，我记得便有外国报纸称他为“豪杰”，称他的军队为“中国之一线光明”。今天来看，冯的治军，为人及其军风，确大有与众不同之处。11年中，我对他的深层政治活动接触不多，但所见所闻不少。因此，想借这篇琐记，把一些别人所没有涉及的见闻，可以说明冯的为人的，都如实记载下来，以供参考。

从自打耳光夜读说起

我入伍不久的一个晚上，约11至12时，轮到我站岗，忽然听见冯管带的房里传出几声清脆的耳光声。我跑近一看，大为惊奇。原来房中除冯外，并无别人，桌上放着一本书。他是因为读书疲倦，打起盹来，因此自打耳光，以资惊醒。这件事对我印象很深，直到今天，我也不能忘怀。以后，冯在对部下讲话和闲谈中，常常回忆起他个人自学的经历。冯说：他生长在保定府，12

岁到小站，投入武卫右军当兵。从小家贫，不能上学，入伍之后才开始刻苦自学。

“我在棚子里才学认字，”冯说。“那年月，识字的军人可真不多。认不得的字，我就拿到营外，找杂货铺里的管账先生去问。回到营里，一有空我就练字、读书。到了晚上，我在棚里洋油灯下看书。同棚的弟兄有人说：‘喂，这洋油是大伙攒钱买来的，供你一人使的么？’好，第二天我就自己打洋油看书。谁知道这也不行，我的棚头（班长）说：‘你没听已经吹过熄灯号了？不服从号令行么？灯照得我们睡不着，你想当官，看看你的坟山，有那好风水么？’我又想了一个办法，去买了一个破斗，把斗的四面去了一面，又买了一个灯碗，买了一个点豆油的小灯放在斗里，这才读成了书。以后当到哨官（连长），就好些了，请了个私塾先生来教我。——比起你们，现在有八百字课（冯部自印的一种扫盲课本）还不好好念书，行么？”

确实，在我入伍后接触冯的 11 年中，他自学一直是很努力的。我记得他升了京卫军左翼第一团团团长之后，有时间就读古文、习作诗文、练颜体字。1914 至 1915 年打完白朗之后，冯部奉调由陕赴川，他在马背上总是手持一卷，孜孜不倦。1918 年以后，他在常德当旅长时，不但读古书，还请了一个牧师教英文，请了一个日本人高桥教日文。对于自学，他一直是很重视的。

在行军之际，冯还自编了一首《勤学歌》，教全军都唱。其词曰：

勤为无价之宝，
成功唯在勤。
不受苦中之苦，
难为人上人。

我所知道的冯玉祥

古有悬梁刺股，
负薪与挂角。
人生百年如梦，
岁不待我们。

从这首歌里，也可看出他勤学的指导思想。

反对二十一条和编唱《国耻歌》

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了二十一条。那时我们驻扎在陕西汉中，冯听到消息，大愤！便登台对全军讲演。我记得他说道：“今日日本人欺侮我们，早20年我们小，晚20年我们老，不早不晚，刚好现在欺侮我们，我们有责任打！四万万同胞，拼他个小日本，一定能得胜！”

冯的讲话鼓动了全军，群情激昂。石友三上台表示大家不要饷，建议把军饷集中起来支援反对二十一条，全军通过。同时又以全旅名义致电袁世凯，表示如与日本开战，我们秣马厉兵以待，愿为前驱。从这时起，我们每次学习，均以日本为假想敌。

冯又自编两首《国耻歌》，教唱全军。因年代太久，第一首只记得起两段了。词曰：

甲午年，日本造反。失去大沽口，海军轮船失落完。割款赔台湾！

庚子后，义和神团，除去外国人，八国联军侵中原。赔款四万万！

此后每次集合讲话时，全军先唱此歌。

撕马褂作纪念

1916年，冯奉陆军部令自四川调回，驻军廊坊。其时，冯在政治上的靠山陆建章已被陈树藩驱下陕西督军的位子，取而代

之。因此，段祺瑞政府便企图将冯部建制分隶别的军队，解其兵权。冯当然不愿意，于是，段政府令驻南苑、通州、天津的部队向廊坊十里外集结，取包围之势。

这时候，冯在全旅中威信很高，全旅官兵得此消息，大愤，集议要与来包围的军队决一死战。冯鉴于寡不敌众，硬拼必然吃亏，便出面阻止了大家。他说：“为了我一人打，师出无名，又坏了我的名誉。只要你们不要忘记我，也就够了。”于是，他通电下野。陆军部当时也转了个弯，没有拆散部队，下令以该旅团长杨椿堂代理旅长。

冯走时，全旅连长以上军官在廊坊火车站送别。其时有人很激动，把冯所着马褂当场扒下，撕成一条一条各持其一，以作纪念。这在纪念品的历史上也算是别开生面。

冯离开军队为时并不长，1917年张勋复辟，段祺瑞马厂誓师之后，冯重回廊坊，在营门大喊：“快来打大辫子兵哦！”把连以上军官集合起来，进行了一番动员。最后，他表示个人态度说：“我是来玩票的。打一个漂亮仗，我还是下野传教！”从此，冯又重掌兵权，参与了反复辟之战。

打英国资本家

208

1917年秋，冯玉祥奉陆军部令率部援闽。他把部队开到浦口就按兵不动了。到了冬天，又奉令改道援湘，率全旅乘招商局“江孚”“江新”等十数只轮船西上。冯自己乘坐“江孚”。那时，我担任他的卫兵长（排级）。

船到九江停泊那天，我正在值勤，忽听见下面甲板上人声喧哗。原来，有一个英国人从岸上上船来，说要看船上机器房的英国同乡机师。我们的卫兵告以此系兵船，不可擅入，要上船必须先有命令才能放行。那个英国人一边大骂，一边举手打了卫兵两

个耳光，往上就冲，于是一阵大乱。

当时，我闻声下梯，正好碰到那个英国人已经爬上扶梯来，下面弟兄们一喊，我居高临下飞起一脚，把那个英国人踢下梯去，滚到了甲板上。我叫：“先把他绑起来！”那家伙赶快从身上掏出五块银元，嚷着说：“钱、钱、钱……”旁边一个弟兄说：“谁要你的臭钱！”一把将他掀倒，绑了起来。于是，我去报告冯旅长。

冯正在舱房里练字，他听了报告说：“绑起来，等我写完这张字去问问他！”过了十几分钟，冯下来把那个英国人大训一通。还说：“你们国家号称文明，你今天先动手打人，这样野蛮！这里是**中国兵船**，不是英国租界！”那家伙还在分辩，冯先生给了他一个嘴巴，又加上一脚，回过头来说：“脏了我的手！护兵，拿鞭子抽！”于是，我们一齐上去，给了那家伙一顿饱打。

原来此人乃是九江英美烟公司的经理。出事之时，他的随从已经飞奔下船去求救。后来由一个牧师出面（因为冯是基督徒）说好话，又派人送了许多礼品上船赔罪。这样，才把这个英国人领回去。

装病见曹吴

1917年冬，冯玉祥旅坐船到湖北武汉便停止前进，分驻要道。冯随即请陆建章联合长江三省（江苏督军李纯、江西督军陈光远、湖北督军王占元）与冯一起联名通电，主张和谈。这时北洋政府皖系当权，于是总统冯国璋下令，把冯玉祥撤职留任（其时，冯已加入直系，因此和皖系处处闹矛盾）。

冯也不管这样那样的处分，天天在武穴带着部队练习山地战。一天，他乘马回营，由马上摔下来，声称腿骨摔伤，被抬回旅部。从此，陆军部虽然一直急电催冯旅开往湘西，冯总是借口

腿伤未愈，不能进兵。直到发表了直系的曹锟做四省经略使，曹派人到武穴和冯联系好，冯才率部开到武昌。几天之后，冯得知曹锟已和第二师师长吴佩孚专车南下，便拄着一副拐棍，到汉口以北刘家庙车站去等候。这次我没有跟他去，以下的事情是听随他去的弟兄回来说的。

据说，专车到刘家庙时，一停车，曹锟就在车上叫道：“下面拄双拐的是冯旅长吗？”冯应声说是。曹锟便叫副官们把他架上车去。冯上车敬礼后，说：“我在武穴，好像小孩子一样淘气不听话。蒙大帅的原谅，我今天特地来辞职。请大帅另择贤能，使我得以养伤。”曹说：“派别的人到你的队伍，你那些官兵未必听话。还是你去湘西，把蔡钜猷、鲁涤平他们赶走，我保你升湘西镇守使，再扩充点兵力。”正谈时，忽然火车鸣笛，吴佩孚说：“你快下车吧！”冯便告辞下了车。吴佩孚从窗口探头大声说：“你把拐杖忘在车上了！不要装病了，快到湘西，把临澧、常德、桃源拿过来吧！”于是冯、吴哈哈大笑而别。

湘西三战夜袭桃源

冯部开入湘西，主要敌人是地方军阀蔡钜猷、陈嘉祐、鲁涤平的部队。冯部一战取临澧，二战取常德，三战就是夜袭桃源。

冯平时最喜欢叫部下练习夜战、夜袭。民国四五年，他就编了《夜战歌》和《夜袭歌》，在军中教唱，至今我还记得。——

夜袭歌

敌人昼战夜必困，
步哨偷睡无精神。
暗进、暗进！
须乘敌人打睡盹，
无般防备好时分。

我所知道的冯玉祥

路崎岖，看不明，敌就不睡看不清。
奋勇扑敌人，
敌人必溃奔！
愿我军人学甘宁！夜袭敌营！

夜战歌（一谱，五节）

一

古今来，各种战斗，
夜战为最难。
森林村落皆黑暗，
进退实维艰。

二

远望见，队伍前进，
要去冒险问：友军我军与敌军？
务必辨清真。

三

夜行军，保持步度，距离忌伸长。
最忌张惶与紊乱，
镇静要当先。

四

当侦探，严密搜索，
警戒我全军。
刚胆、沉着自慧敏，更贵有热心！

五

倘若是，失迷方向，
举头望月明。
更有指北针可用，或看北斗星！

当时，桃源驻守的敌人除了蔡钜猷一个团外，还有所谓“神兵”数千人。“神兵”号称肉身不避子弹，武器是白蜡杆、长矛，作战时且用符咒，“神兵”头子尚穿八卦衣、执鹅毛扇，这是一支妖气十足的队伍。

为了夜袭桃源，冯是苦心布置的。他从各团中挑选了100名精壮之士，必须是练过拳、喜用火器、能单刀破枪的人，每人身背大刀。我也在百人之内。那天夜晚，大雨如注，我们100人翻城墙而入，砍倒门军，放开城门，与“神兵”巷战。“神兵”最初还用肉身拚火器，战斗甚猛，终于倒下的越来越多，七八小时之后，我们攻占了桃源。残余“神兵”则退往原州一路。原州即所谓“后州符”之发源地，也即“神兵”的老窝。

从那时起，冯便升了湘西镇守使，驻常德大练嫡系队伍。

支持打日本洋行事件

1919年，五四运动兴起，全国反日风潮弥漫。这时，常德城里有一个日本洋行，老板高桥，即教冯日文的人。运动发展到了常德，学生们爱国热情高涨，砸毁了洋行。高桥哪肯示弱，立即打电报给日本政府，声称常德民变，将他的货物抢劫一空，要求向中国政府交涉赔赏25000元，并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情事。

当时，冯在常德，他将常德县长薛笃弼叫到湘西镇守使署来，问薛如何处理？薛说：“洋行是学生捣毁的，还有几十个商人和老百姓。我已经把为首的几个人抓了，叫他们赔偿。”

冯说：“不是这个办法。你先把这几个人都放了，马上找电报局长，把日本人那封电报扣下来。先把我们的电报发出去，再登他的。”薛照办不误。

冯叫薛发的电报，是以湘西镇守使冯玉祥、常德县长薛笃弼和常德县商会三者名义分别发给北京政府的。主要内容是：“常德因有人向日商洋行买货，争执价格，言语不通，打坏了几块玻璃，并未造成民变或抢劫事件，合行呈报”云云。这三个电报发完，再发日本人的电报。

日本政府接到高桥电报，即转日驻华使馆向北京外交部交涉。结果，我方拿出常德三封电报作证，说明不能负责。几经交涉，后来双方同意先电询一个在常德的美国牧师，查问真相。偏巧那个美国牧师与冯处得不错（美、日矛盾当然是根本原因），因此回电说并无民变。于是日使馆只好叫高桥自己就地交涉。

高桥先找到薛笃弼，口气已经软了，只要求赔偿 1000 元。薛心中有数，说：“我不当家，你还是找镇守使去。”于是高桥又来找冯。

冯说：“你是想暖和一晚上呢？还是想暖和十年八年？”高桥说：“此话怎讲？”冯说：“你买卖要做长，要做短，看你自己。我们若是赔了你 1000 元，老百姓气愤，不做你的生意，损失还不止 1000 元哩！”高桥仍然坚持无理要求，冯便问：“你来中国的时候，带了多少钱？”高桥说：“大约 500 元。”冯又问：“现在有多少？”高桥说：“大约有万把块钱。”冯说：“那就看你想不想做下去了。”高桥不甘心。冯气极了，把桌子一拍：“王八蛋！要钱不要脸！给我滚了！”吓得高桥抱头而去。

最后，一个钱也没有赔给高桥。

冯是怎样失去半个小指头的

冯盘踞湘西，与当时统治湖南的皖系军阀张敬尧产生了矛盾。其时，冯的老婆刘氏有一个堂弟，在张敬尧手下任团长，张

就派他到常德来活动，冯部官兵称之为“刘二舅爷”。

刘二舅爷到了常德不久，即装精神病发作，冯请了一个在常德的美国医生，人称罗医生（中名似是罗感恩）来看病，冯陪着罗医生在榻前诊视。罗诊断后，说刘并没有发病，刘忽大骂说：“哪个要你洋鬼子来看病！”说着，就从被底抽出手枪，一枪打去，弹入罗脑，罗医生应声而倒。

刘随即对准冯开第二枪，被冯把他手膀一格，枪弹朝上飞去。刘的臂膀已被冯捉住，而枪犹在手，便把枪头朝下，对冯开第三枪。冯一躲，小指头一截已经被打下。这时卫士闻声入内，刘被当场抓获。

冯立即审问刘二舅爷，对他说：“我信耶稣，因此我爱仇敌。你只要说出那个叫你行刺的，我就放你。”及刘供出系张敬尧主使之后，冯说：“你去对张敬尧说吧！要打就打，要刺就刺。他有刺我之法，我有防他之心！”便把刘二舅爷放走了。

罗医生既死，冯令官兵送葬，并电告美驻华使馆，抚恤罗家属一万元。罗的家属知道冯是基督徒，便将抚恤金购一木制能活动拆卸之礼拜堂，从美国送到信阳，送给了冯。

刘走之后，冯把留了十多年的胡子剃了。我见他的样子发笑，他说：“你笑！我这是性命重生，再世为人咧！”

214

军队中的牧师

军队中设有牧师，在近代史上，除太平天国是特例外，冯玉祥可谓只此一家。

在1912年以前，冯只是个人信仰基督教，并没有推行到部队。冯对我们说：他在信教之前，有一个哥哥吃喝嫖赌，无恶不作。冯大恨，起下杀心要杀他。在动身赴他哥哥处之前，路过教堂，忽然听见牧师传教，正在宣传基督要爱仇敌的道理。冯听了

以后，居然大彻大悟，放下杀刀，入了基督教。

1918年，冯到常德立下地盘之后，便开始在部队中大力推行基督教。起初，他聘请一些牧师到常德向全军讲道，来的牧师近自常德、远自汉口，中外都有。后来，便逐渐有了随军牧师，随着队伍扩大，大致上是一个旅一个牧师，最多时有七八人。这些固定下来向士兵说教的牧师则全是中国人，他们大多是由美以美会的刘廷芳博士介绍给冯，加以任用的。冯是在刘博士那里领洗的，所以两人关系特殊。

由此，部队里有了一套宣传宗教的仪式，凡官兵读经、祷告、唱诗、受洗、礼拜，都由牧师主持，大讲灵魂升天之说，我也是那时在常德入教的。

部队里凡信教的官兵，每人发给圣经一本，早上起来，先唱国歌，最初是唱老国歌“中国雄立宇宙间……”，开往北京后改唱“卿云烂兮”的“卿云歌”。接着，读一个小时书。吃饭、睡觉则唱圣诗、做祷告。每逢星期日，凡信教官兵必集合于操场（或旅部），由牧师主持做礼拜如仪。有时由冯主祷，冯也对我们讲道。他的讲道，注重“精神学”，即把中国的圣经贤传和许多封建道德观念与基督教义结合起来，而仍以前者为主。冯主持自编“三精神书”，即爱国精神、军纪精神、道德精神三本书。其内容分条，类似格言和箴言，规定官兵每人必须能背诵。至今若干条我还背得。例如：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我不杀敌，敌必杀我。我不以死救国，则我必作敌之俘虏。杀敌与否可知。

英雄本色，在枪林弹雨之下言笑自若，更易使人看出。

战死在国，病死在家。荣辱之间，不可不别。

受伤能笑而歌曰：“吾荣矣！吾荣矣！吾为国家受荣也！”

以上是爱国精神的几条。

军纪者，命脉也。人无命脉必死，军无命脉必败。金人有言：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中东战时，拾到日兵手记有云：日本军者，只知前进而不知后退者也。

这是《军纪精神》举例

悔改上要用功夫。闻过必改。过则无惮改。过而能改，复于无过，善莫大焉

谦让不可少，谦受益，满招损，凡人能温良逊让，而人无不敬爱之者……

草故鼎新，刮垢磨光。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每夜就枕，必思一日所行之事。所行合理，则恬然安过。或有不合，即辗转不能成寐，思有以更其失。又虑始勤终怠也。

这是《道德精神》举例。这本书里还引了许多曾、颜、子路、墨子等的故事。而基督教的故事却很少。可以看出不少是冯从一些理学家语录和《曾胡治兵语录》里搬过来的。

216 由于部队推行基督教，我们的生活中又增加了一个特色，那就是：冯部的军歌编得特别多（冯注重用军歌作为宣传武器，这一点也是当时别的军阀所不及的）。而差不多所有的军歌，都用赞美诗的调子来唱，每唱，以时音或军乐队伴奏。本文所引各歌，大都如此。因此，以圣诗调子来唱军歌，这也是中国军队中少见的奇事。

随军牧师制度一直推行到1926年。冯从苏联游历回来之后，便到处说宗教是文化侵略，取消了军队中的牧师，把他们送回了教会。

冯的用人

冯的用人和培养嫡系力量，有自己的一套办法。

冯部军官，最初大多为陆建章私人的，后来，冯才逐渐树立自己的力量。他招收新兵，不要营混子、兵油子，干过别的军队的也不要。他要的是农民、学生（民国五年叙府之战以后，冯派杨椿堂团长到河南招新兵一团，时我已升排长，随杨同去，冯特别交代新兵条件）。新兵入伍后，选拔其中较有文化水平的组成模范连，加以训练。模范连的工作，从1915年即已开始。我进模范连时，连长是韩占元、程希贤，但领导始终由冯自己抓。由模范连出来的，升任下级军官。排以上军官，则组成军官教导队（民国十二三年后改称教导团），再加以训练，这样逐步树立了自己的力量。大约三年之后，冯终于把陆派军官全部撤走。这些军官向他辞职，他说：“好，我庙小坐不下大神，请吧！”

冯的嫡系都是自己行伍里出身的人。冯对这些人是经过多次考验才提拔的。在他任营、团长时，时常于晚上穿一件兵士大衣，趁值岗士兵不在时，他就摸到空铺上和士兵睡在一起，听士兵们谈什么，所以他极能掌握下面的思想情况。在冯的部队中，公开明确所有官兵不许串营，不许与其他部队交往。在官兵之间则经常叫人汇报情况，官兵有连环保。这些工作，冯是抓得很紧的。

我记得冯当旅长的时候，补一个新兵，连营长也不当家。每个新兵冯必亲自挑拣。盘问了历史，检查了身体，合格才能补上。他当营长时，能说得上全营士兵的姓名和籍贯，他也不时地问连长，看连长对每个士兵的姓名、历史、优缺点能否答出，答不出的，立即罚跪，并且大训一通。

对于非嫡系的队伍，冯是极端不信任的。例如湘西之战，湘

省军阀部队中有个营长叫曾绍武，在常德之役率全营向冯投诚，冯即派曾营作游击队。常德既定，冯立刻调曾为旅部副官，曾所属全营，调到常德师范学校后院，点名以后，发饷遣散，同时收缴枪支。曾绍武当然也立不住脚，做了副官不久就辞职走了。

冯掌握地方政权以后，对追随他多年、信得过的佐官（军需、书记官、军法官、军医官等）或者同事，便安排作地方行政官。例如薛笃弼由军法官出任常德县长，军医官邓琢如出任澧县县长，书记官江粹青后荐到甘肃任某县县长，与冯同充营团长的董世禄被派任天津市税局局长等，都是由这条用人原则来的。

大致说来，冯用人，一要追随多年，二要不畏劳苦，三要与冯部以外的军队无接触，四要绝对服从，能任责罚。在培养嫡系时，冯不但注意行伍出身，也很注意籍贯，他专用北方直、鲁、豫三省的人。现在可以数得出来的，山东人有杨桂堂、谷良友（曹州府）、赵登禹（菏泽）、宋哲元（乐陵）、石敬亭（济南）；河南人有吉鸿昌（扶沟）、梁冠英（郾城）、李鸣钟（沈邱）、朱永和（郾城）；河北人有韩复榘（霸县）、佟麟阁（高阳）、张之江（盐山）、鹿钟麟（定县）、孙良诚（天津）、刘汝明（大名）、刘郁芬（清苑）、孙连仲（雄县）、冯治安（景县）；只有一个石友三是东三省人。当时中下级军官中，山东曹州府、河南归德府、河北景县的人尤多。上述这些人也莫不从当兵出身。例如朱永和和我同时当兵。我当班长时，宋哲元作排长，冯治安、佟麟阁、张自忠都是班长，赵登禹和我算是曹州小同乡，那时还在当兵。

对于当兵的抓得这样紧，冯是自有其看法的。他对我们说过：“当兵，要知识简单才好，要是他比你高明，你管不了他。要找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人，打起仗来不怕死。官长总得比兵强，

中级军官要胜过下级，才能指挥得动。”这是他的总结。

冯也从历史上吸取了经验。他最怕部下倒他的戈。我随他11年，没有听他说过他哪一个上司的好话。因此他决不用非嫡系的人，凡陆军大学毕业派来的学生，冯只让他们当参谋，决不让当部队长，也永不让他们掌兵权。参谋长做事从不当家，冯对所有的事一向独断专行。邱冰、蒋鸿遇都做过他的参谋长，一次，蒋在做工作时效率较慢，冯就对他说：“参谋，参谋，你吃馍馍！”终于使蒋一气而走。

为了搜罗精锐保卫自己，冯自1916年起成立了手枪队。每人发一大刀，一支盒子枪，挑选掌握国术之人组成。我任班长时即在手枪队里。

冯培养嫡系的情况大致如此。但是，他重嫡系不等于重私人感情。冯在当兵时，有个同棚兄弟叫游鹤亭的，后来不当兵了，在保定府说书，听说冯做了官，便跑到常德来向冯要官做。冯对他说：“我学的是兵术战法，你说的是三国聊斋，怎么能做官？好吧，给你派一个勤务兵服侍，一个月拿60块，逢星期天，你给士兵讲一回书。讲关公岳飞聊斋，不要讲花天酒地，官不能给你做！”就这样，部队里除了牧师讲道外，又多了一个专职说书人。

◆（李肇武，曾宪洛记录整理）

常德亲见

1920年，冯玉祥先生率领陆军第十六混成旅驻防湖南常德时，我担任旅部少校洋文书记官，同时教冯读些英文。由于这样的机缘，在公余之暇或教读间隙，和他闲谈的时候比较多，因此得以详细地听他谈叙他过去的一些事。

冯的出身和学习生活

冯玉祥字焕章，原籍安徽省巢县人，幼年随父到河北省保定府（今清苑县）。因家境贫寒无立锥之地，11岁时在保定入伍当兵。在一次闲谈时我曾问过他是哪个军校毕业的，他笑着对我说，因为家里穷，一天书也没有念过，假如有一间房、一亩地，我也不会入伍的。他入伍后，被分配到棚（旧军制的棚相当于新军制的班）里去当兵。棚里的弟兄们除了上操上课以外，还担负着轮流在棚外站岗放哨的任务，可是弟兄们有空就聚在一起赌钱，不愿意出去站岗放哨，由于冯自己不会而且不愿意赌博，因此每逢轮到同棚别个弟兄站岗守卫时，都请他代为值勤。正因为这样，才使得他有充分的时间学习。最初，他买了一本《杂字本》，一面抱着步枪站岗守卫，一面手持书本认字。以后由《杂字本》而《百家姓》、《三字经》、《四书》、《五经》等书，甚至旧社会认为是闲书的《三国演义》、《列国演义》等，他也认真读过。特别是《三国演义》一书，他能从头到尾全部背诵出来。他曾说过他能把《三国演义》这部书以说评书的方式讲说出来。在学习过程中，并不是没有困难的，凡是遇有不认识的生字或对书内章句文义有不懂得的地方，他就随时请教军中一些会笔墨的人，直到弄会弄通为止。

此外，每天无论怎样繁忙，他还要写两篇大字，就是在行军作战、炮火连天的情况下，也从不间断，每到一宿营地，就由随从弁士将随身携带的特制行军桌椅展开，摆上笔砚写他这两篇大字。到1920年他39岁驻防湖南常德的时候，对于书法已经有了相当的成就了。记得当年夏天我和他同到常德北门外山上避暑，一天我们漫游山谷中，发现一股小小的泉水，颇为甘冽，因为这是个荒山，泉水无地储积，听任流溢山下，不予利用，觉得实在

可惜，于是立即派人找来了石工，在滴滴泉水的处所开凿了一个小小的池子，把泉水储积起来，以便他人来到此地时可以饮用。当时冯兴之所至立刻提笔写了“德池”两个大字，刻在山石上留作纪念。字写得是那么刚劲饱满、神气内蕴。这个石刻倘若没有被破坏的话，或许至今仍旧存在着吧！

冯的民族革命思想

1911年革命军尚未在武昌起义的时候，清政府曾抽调驻防奉天（今辽宁省）的新军第二十镇（镇相当于师，镇的长官是统制，相当于师长）进关参加秋操。这支队伍在到达京东滦州（今滦县）后就得到武昌起义的消息。该镇统制张绍曾立即联合第三镇协统（协相当于旅，协的长官协统，相当于旅长）卢永祥等联名打电报向清政府提出类似最后通牒的十二条。结果事未成功，



1924年9月冯玉祥在陆军检阅使署接见苏联大使加拉罕

张绍曾本人却被迫离开了他所统率的第二十镇。这是因为第二十镇原是从北洋六镇中各抽调一部分官兵混合编成的。内中一部分军官是具有民族革命思想的，例如冯玉祥就是其中的一个，但是也另有一部分军官仍然具有封建保守思想。因此，在该镇内部就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清朝统治者对于这种情况是了解得相当清楚的。他们就采用了分化手段加强了保守派的力量，从而迫使张绍曾不能立足，终于离开了第二十镇。

张绍曾出走后，该镇内具有民族革命思想的管带（相当于营长）冯玉祥联合同镇另两个管带施从云、王金铭密谋起义，并宣布独立，响应了革命军。他们为了表示决心，都把发辫剪去了。不料因寡不敌众，被驻防芦台的王怀庆军包围击溃，施、王两个管带被俘牺牲。冯突围逃出，在外逃途中到了一座寺院，换上了一身袈裟装作和尚的样子，乘上火车潜来北京隐居。直到辛亥革命成功，才再出头露面。当冯谈到这一经过时，我曾问过他，对清政府说来，你是一个反叛，怎么不到别处逃生，反倒往北京去送死呢？他笑着说，他们料着我决不敢自投罗网，我就给他们来一个出其不意，这样做倒是一个最安全的办法啊！其后袁世凯窃位为大总统，派陆建章训练新兵，由于陆的保荐，冯才又东山再起，被任为统领（相当于团长），驻防北京北苑，担任训练新兵的工作。

222

傅良佐对冯前倨后恭的一段故事

1912年，河南农民起义军的首领白朗打着杀富济贫的旗帜，在河南、湖北的信阳、襄阳一带掀起了农民起义的斗争。他们攻陷了豫、鄂、皖等省的很多城池，还击败了北洋军阀王占元部下号称精锐的第二师。袁世凯看到农民起义军节节胜利，势如燎原，大为恐慌，特派陆建章为“剿匪督办”，发动了对起义军的大规模围攻。陆就把冯团扩编为一个混成旅，开往河南参与作

战。这支起义军以寡不敌众，白朗本人又因病死去，终于失败溃散了。

冯在这次战役中，缴获了大量的弹械，随即奉命班师回驻廊坊。这时冯以弹械增多为由，请求当时陆军部就所缴获的枪支数目扩编军额，不料竟遭拒绝。与此同时，张敬尧的队伍被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只剩下师长一个人光杆回来，陆军部反而替他重新建制编足一个整师，仍旧归张统率。冯看到当局如此行事，大为不平，就亲身到陆军部去找当时的陆军次长傅良佐重申前议，据理力争。不料又遭到傅良佐的严词拒绝。鉴于当时军政当局这种蛮横不公的情况，冯愤而辞职，到北京西山暂住休养。陆军部虽另派旅长一人接替，但还未及到任，张勋就挂起龙旗复辟了。驻防廊坊的第十六混成旅全体官兵认为北京政局如此混乱不堪，全旅不能无人主持，遂决定推派代表前往西山迎接冯先生回到廊坊旅部，主持大计。段祺瑞马厂誓师后，由于廊坊地处京、津要冲，为了讨张军事的顺利进行，非与冯取得联系不可，于是派人到廊坊协商。所派代表不是别人，正是不久以前对冯蛮不讲理的前任陆军次长傅良佐。起初傅恐对己不利，不敢担此重任，嗣经段再三说明，冯是以国事为重的人，绝不会会计其前嫌，保证可以无事，傅这才勉强答应下来。当即由路局准备专车，满载犒赏全军的物品，直驶廊坊。车到距离廊坊车站约半华里的地方停住了，傅先派随员到冯旅部通报，并观看动静。如其情况不利，也好调头逃回天津。经来人向冯说明来意，并告以傅在车上等候云云。冯立即只身偕同来人前往车站迎接。一面走一面与来人有说有笑。傅在车厢中看得很清楚，约计相距百步之遥时傅始下车一步一鞠躬，直到两人对面握手时为止。冯随即督率本旅官兵由廊坊直趋北京，进了永定门，击溃了辫子兵。张勋逃入东交民巷荷兰驻中国公使馆，一场复辟丑剧就此结束。

反对内战及武穴主和

复辟丑剧闭幕后，段祺瑞再度进京组阁，梦想武力统一全国。当时盘踞在福建、广东两省的军阀，都不是他的嫡系，段就想一并铲除，以圆其武力统一全国的迷梦。1917年，段编组了两支大军南征：一支是以吴佩孚打前阵援粤，一支则以冯玉祥为先锋援闽。冯率全旅官兵沿津浦铁路南下，经由浦口开至湖北武穴停止前进，就此安营驻下。但是冯部是先锋部队，尾随冯部南下的部队，正源源不断地乘车南来。由于冯停军不前，后续部队当然无法前进，形成铁路沿线兵车拥塞的现象。段大为着急，一日数电，催促前进，冯均置之不理，并通电主和。段祺瑞接到主和电后，大为震惊。段的爪牙中，有人认为，小小的一个混成旅能有多大实力，可令后续的亲信部队把它包围歼灭，消除祸根；又有人说，冯旅士兵打起仗来称得起是一当百，须要慎重考虑，不可等闲视之。段本人也认为冯是当代人才，收归己用，最为上策。因此就派了冯的旧长官陆建章专程由京前往武穴劝说。冯见陆建章前来，考虑到若遵命起兵援闽，则内战一起，兵连祸结，实有背通电主和的初衷。否则，又难却旧长官的情面。有一天，冯带同随从弁士数人骑马外出，正在放辔驰骋之际，冯忽然从马上摔下来，随从弁士们一见大惊，急忙下马向前问询，只见冯抚足呼痛，不能起立，及将军医找来看视，冯仍呼痛不止，因此一致认为冯是落马受伤，随即回营中休养。陆见此景象知冯非言词所能动，也就悄悄转回北方去了。正在这个问题不得解决的时候，坐镇武汉的四省经略使曹錕忽而出面缓颊，电请令段饬冯旅开驻湖南常德，并保荐冯为湘西镇守使，因此南征援闽之举也就云消雾散了。

布鞋向缎鞋敬礼

1920年春，有一天我同冯走出旅部大门到街上散步，转回来的时候，刚要走进旅部大门，他老远就向守卫在大门口的士兵立正，举手敬礼，并且站定不动，两眼注视着守卫士兵的两只脚。就在他立正敬礼之前，这位士兵看到长官回来，早已举起了步枪，严肃而又恭敬地向长官敬礼（旧制军礼，士兵向长官行举枪礼的时候，长官还礼，在手未放下人未走开时，枪是不能放下来的）。长官既站定不动，手不放下，士兵也就只得保持着举枪敬礼、注目而视的姿态，不能松懈下来。在这种情况下，这位守卫的士兵感觉大大不安，惊惶失措，当时我在旁看着这种情况也莫名其妙。紧接着，听冯先生对这位士兵说：“请你把枪放下来吧，我不是给你敬礼，而是我穿的这双布鞋给你穿的那双缎鞋敬礼。”我向那位弟兄脚下一看，原来他穿的是一双很亮堂的缎鞋，这才了解了这一幕戏的原因。接着，冯对该士兵讲了些不要忘记本、不要学奢侈等勉励的话。这件事传遍全军，对于全体士兵起了很深刻的教育作用。

派兵“保卫”日本人的商店

湖南常德是内地通商口岸之一，日本商人在该城内设有一些商店，其中一家百货商店表面上是出卖日用百货，实际上却是出卖海洛英、吗啡等毒害我国人民的毒品的处所。冯到常德了解到此种情况后，认为自己身为地方军事长官，负有取缔的义务，但此事若直接出面干涉，又恐惹起外交上的问题，因此想了一个最妥善的办法，那就是借着保护外侨为名，派了两个战士背枪站在日侨商店门口守卫。这么一来，当地的那些瘾君子就再也不敢登门购买毒品了。过了不多日子，该日侨因为没有顾客上门，生活

无法维持，也就只得关门大吉，悄悄回国去了。

(赵卓志)

体察民情

1927年，冯玉祥由西北进军中原，驻于开封。这时我在他的总司令部新建的教育部工作。因此，我有机会直接间接知道一些他在政治军事生活中的轶闻故事。从这些故事中有助于了解他的为人和治军；但时过境迁，多被遗忘。兹就记忆所及，略述几个片段。

冯玉祥是行伍出身，是身经百战的总司令。他的部队各级长官，绝大多数都是他早年战友或下属逐级提拔的。他对士兵的教育，是家长式的教育，是冯的子弟兵，所以在他部队中流行着这样的歌谣：“打的亲，骂的疼，不打不骂是路人。”

冯到了官大位高的总司令和省主席时，所需辅佐人员，决不是一个小圈内所能解决的，因而必须向各方延揽所谓“高级宾卿”或“高级幕僚”。对这些人，绝对不能采用“家长式”来对待了。因此，冯玉祥对待幕僚就有几种不同的态度。

首先，以师待之。冯既是穷家出身，幼年失学，长爱学习，同时也由于他的地位一天天提高，迫使他非学不可。他学中文，又学外文；既学散文，也学诗歌；既学社会科学，也学自然科学，等等。因而他的专业教师不止一个，也有条件请到一些饱学之士。他对这些专业教师，是必恭必敬，以师待之，一点也不苟且的。人所共知的有王瑚（铁珊）、徐谦、陈国梁等。

其次，以友待之。总司令部除了军事之外，也有一些科学、

文化、卫生、教育事业，因而添设教育部专管其事，都需要专业人员以主其事。冯在这方面，也很想和他的军事一样，做点突出成绩，于是多方延揽大学生、留学生以及一些负有声誉的专家，云集于开封，盛极一时。著名的如教育厅长江恒源（向渔），教育部长凌冰（济东），查良创（勉仲），河南中山大学校长邓莘英，还有陶行知、邹秉文、许士骐等等。他对这些人都是以友待之，对他们不摆架子，谦虚谨慎，促膝谈心，采纳意见。但其中的友谊程度又各有不同。与陶行知则属于“咬耳朵”之类的友谊。

再次，以僚属待之。中级以下人员，不管是聘请而来，还是自动投效的，一般说，都是以僚属待之。但其中也有程度的区别。至于从子弟兵中提升的，那就不管他地位高低，都是以僚属待之，但与一般僚属又是有区别的。

二

冯玉祥的名字，原来不叫“玉祥”而叫“玉香”。怎样改的？谁替他改的？有一段小故事。

冯玉祥入伍时，名叫“玉香”，以后逐步升为排、连长以至营长，依然还叫“玉香”。升为团长以后（是否团长，不很明确，但肯定还不是旅长），在北京投片进谒京兆尹王瑚（即上文师中王瑚）。王见冯相貌魁伟，谈吐不凡，心生爱意，从此常相往来，相谈甚得，冯亦以长者尊之。某次，二人又相聚，王说：一个人的名字，本来只是一个记号，也就无所谓好，无所谓坏了，但在习惯上常常代表一个人的名位事业，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地位高，事业大，而他的名字倘若庸俗小气，无形中就会降低人的尊严。因此，我认为你的名字“玉香”，就和你今天的地位事业很不相称。冯认为很有道理，便欣然向王说：“我自幼贫穷，没有

上过学，名字也是老人家随便起的，入伍后也没有改，就一直叫下来了，现在，就请老师代我改换一个名字吧！”王略加思索说：“你的官职已经不低了，‘玉香’也已经叫开了，全改是有不便的。我想给你改换一个字，把‘香’改为‘祥’，不叫‘冯玉香’而叫‘冯玉祥’了，不是音很相近，好像没改的一样吗？”冯大喜，从此便改叫“冯玉祥”。

三

冯玉祥在开封时，不要人称他“总司令”或“主席”，要求以先生称呼。按那时的风俗习惯讲，“先生”是一种很广泛的普通称呼。但是，“先生”二字落在“总司令”和“省主席”身上，其含义就不同了。

总司令部的文人和省府系统的厅、局中高级干部，特别是列在师友的，不论在什么场合或私人谈论中，涉及冯时，总是说冯先生如何，或冯先生怎样。这些人和冯对面谈话时，径称“冯先生”不称“总司令”或“主席”。冯和这些人对面谈话，或在公开场所提到时，也是称某某先生，例如对教育厅长江恒源，不称江厅长，而称江先生；对教育部长凌冰不称凌部长，而称凌先生，等等。但在他子弟兵系统之内的人员，就不在其例了。

四

冯玉祥系统的军队，官兵都无薪饷，是人所共知的。冯兼河南省主席时，对省府系统的厅、局人员，基本上采取和军队一样的待遇，他的理由是：革命尚未成功，人民生活太苦，不应该增加人民的负担，应把有限的经济用在革命事业上，等等。同时，他又认为政府公务人员的生活习惯、家庭负担，不同于军人，必须加以照顾，因而基本上采取军队式的供给制外，不分职务和等

级，上自省府委员、厅长，下至文书、办事员，每月另发生活补助费 20 元。总司令部的教育部，人员多系文人，也和厅局一样。

对公务人员的生活供应，衣服一律棉布，唯蓝颜色不同于军队，上下级没有区别。吃饭供应，就大大不同了。冯强调说，公务员均属文人，所谓“先生”。要给他们吃得好些，否则会影响先生们的健康，也会影响工作。因此，当时首府各厅、局的伙食是很好的。一日三餐都是白米细面，自不待说，而副食菜肴也制作精细。按规定八人一桌，每逢星期三晚餐，外加两个好菜，星期六晚餐，外加四个好菜。所以各部门工作人员都很满意，称之为“三日一小宴，七日一大宴”。

那时薪给制的工作人员，除少数高级人员外，中下级人员待遇很低，有吃无穿，更难养家。实行供给制后，对中下级待遇，不是降低而是提高了。真正降低的只是中上级的大官，因此，来自苏、浙一带的高级知识分子的大官，被当时革命浪潮所激动前来参加工作的人，只有“哑巴吃黄连”，忍耐一时之后，便“借故请假”，更接着来个“长假不归”，于是人才就这样陆续“逃跑”了。

五

1928 年春，上海、南京等处一批学生来到河南，要求冯玉祥分配工作。冯在郑州亲自接见，并征询他们愿做什么工作的意见。他们表示愿做教育工作。冯说，军队的教育工作，就是教“大兵”（冯对外界人谈到士兵时，惯用“大兵”二字）。他们表示愿意教兵，而且露出教兵的工作是容易的。这种情绪被冯察觉了。冯说，请诸位明天先参观一下军营生活，并给“大兵”们讲话。

第二天，冯亲自陪同他们参观和讲话。之后，冯就他们给上

兵的讲话，提出一些问题，例如术语和名词的问题。冯说，名词、术语，在大学里，先生、学生都很习惯，听了入耳，也很顺耳，但在军队中，就不入耳，更不顺耳了。因为我们都是大老粗，不懂得。对他们讲这些东西，好像对牛弹琴，无动于衷的。冯接着用几句通俗易懂的话，来代替“积极”、“消极”的含义，并问道：这样说法，是不是符合“积极”“消极”的意义呢？是不是“大兵”们就容易懂了呢？学生们连连点头，一致表示同意说：好！好！冯接着说，教“大兵”这件事，说来好像很简单，但实际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兵的都是穷家孩子，没有上过学，一个大字不识的人很多；识字的人，也只认识斗大的字，一两箩筐吧！因此，教他们识字、读书是容易的；但是，他们都是经过南征北战，东奔西跑，见得多，听得多，想到的也不少，因而就有许多实际问题，瞒不过、骗不了的。他们总是要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这又是不容易的……这一番话，说得大学生们口服心服。

学生们此后常对人这样说：冯先生是有真实学问的，见了他，才知道自己没有什么学问，自己是太不行了！

六

230

解放前，一般城市的城门在晚上一定时间都要上锁的。上锁后，再有出进城门的，必须持有当地最高级军警司令部的“通行证”。否则任何人都不能通过。

冯驻开封时，有一天夜间，有人自称总司令部的高级官员，因为在城外回来迟了，由于出来早，也没有预料回来这么晚，因而没有带“通行证”，请门岗通融一次，准予进城。值班门岗说明这个规定很严格，无证不能进出，并强调总司令部高级人员更应严格遵守。这位官员多方解说，自己负有重要任务，若明早进

城，就要误事……值班岗哨坚决不允，并说，你既是总部长官，更不难了解守卫人的责任，决不能放进无“通行证”的人黑夜进城。如果不这样做，不仅是违法的，万一发生事故，哪个能担负得起这个责任呢？你如真有重要任务，通电话也可以解决。这时这位官员态度很强硬地说，依你的说法，什么人都不能通融或例外吗？假设总司令这时从城外来，也不能进城吗？哨兵毫不迟疑地回答说，没有“通行证”谁也不能进城，就是总司令没有证明，当然也不能进城的……说到这儿，这位官员不慌不忙地从身上掏出一件证明，双手递给哨兵。哨兵接过一看，大吃一惊，目瞪口呆，连忙把门大开，口称：总司令！总司令！原来他就是冯玉祥乔装的。冯双手拉着哨兵的手，连称：“好弟兄！好弟兄！你不要以为我是冯玉祥你就惊慌了，你做得对，做得很对！应该这样，以后永远这样做！”

第二天，冯传令表扬这位值班哨兵，并给予奖励。

七

冯玉祥不仅经常乔装普通军人，暗查部队情况，而且乔装老百姓，深入民间，了解人民对他的军队军风的反映。

冯驻开封时，曾乔装外地客人，到城西角游逛。有一老人正在园地做活，他就上前和老人打招呼，谈上几句后，向老人要水喝，便同老人到屋里，喝水后，就和老人及其老伴从家常谈起了。其中主要的对话是：

冯：开封驻的什么人的军队？规矩不规矩？

老人：是冯玉祥的军队！总的说算是好的。

冯：怎样好？好在哪里？

老人：冯玉祥的军队管得严些，不许当兵的随便进老百姓的家，乱闯乱闹；也不许拿老百姓的东西。

冯：能这样好吗？每个当兵的都能做得到吗？

老人：人多品不齐，管得再严，也不是个个都能听话的。少数坏人、调皮捣蛋的，也不是没有的。

冯：有兵到过老大爷家里吗？

老人：没有来过。

这时他的老伴抢着说：当兵的虽然没有到家里来，可是有一天，我的一只老母鸡刚刚下过蛋，从家里跑出去，有两个老总从门前过，就被他们抓去了。我听见鸡叫，赶忙跑出去，鸡就没有了。

老人：一只鸡算个啥，不到家里乱拿东西，就是好的。

冯：一只鸡子说起来算不了什么；可是，拿老百姓东西，总是不应该的，就不能算是好军队。还听说拿别家东西没有？

老人：这倒没有听说。听说冯总司令很厉害，他常常到处私访，当兵的不敢胡闹，万一碰到他，那就不得了。再说几十万大军，管得人人都好，确实也不容易。

冯：老大爷见过冯玉祥没有？

老人：这样大的总司令，咱老百姓怎么能见到。

冯：他出来时看不到吗？

老人：出来时，站着许多岗哨，又有许多卫兵跟着，不许老百姓靠近，又怎么能看见呢。

冯笑嘻嘻地说：“老大爷，你想看看冯玉祥吗？我就是冯玉祥！（随手把帽子取下）请老人家仔细瞧瞧冯玉祥的模样吧！”

老人听说他就是“冯玉祥”，顿时惊惶万状，他的老伴更吓得打哆嗦，话都说不出来了。冯一手拉着老人，一手拉着老人的老伴，笑着说：“我谢谢你们，我冯玉祥从来不护自己的短处，你们不要害怕，我不是不讲理的人。”老人和老大娘吞吞吐吐地解释说：“我们老糊涂了，老总们没有拿我的鸡，我是胡扯的

……”冯玉祥说：“老大娘不要这样，有什么说什么，偷鸡就是偷鸡，说出来很好嘛。”冯这时从身上掏出五块钱来，笑着说：“这几块钱是我赔偿老母鸡的钱，请老人家收下吧。”老夫妻俩一齐说：“不可，不能收，这怎么行呢？鸡不一定是老总们拿去的，即便是的，一只鸡能值几文钱？总司令宽宏大量，不责备我俩老糊涂就好了，要我们收下这些钱，我老两口还有脸吗！”冯反复解释、安慰他们说：“一只母鸡虽不值多少钱，但是下蛋的母鸡，连蛋算上，可就不少了，请老人家收下吧！以后有什么话，有什么事，去找我，或是写信给我，我是欢迎的！我打搅你们了，我走了，再见！”

八

大约是1928年春末夏初的一个上午，冯在开封南门大菜场集合部队及总司令部各单位和省府各厅局干部讲话。冯登上讲台时，左臂夹着一件灰布棉大衣，讲话时才把大衣放在一旁。大意是：外面有些人说冯玉祥会装假。冯玉祥穿布衣、吃大饼，都是装假……是的，冯玉祥穿的是布衣，和弟兄们一样，吃大饼也是不错的。我想，一个人对于吃饭穿衣，真能够作假的话，也不算什么坏事吧！一个人能够在吃饭穿衣上作假几十年，更不算什么坏事吧？！但是，我不管那些人怎样说，我在吃饭穿衣上要作一辈子假呢！我这样说法，当然又会有人在背后议论说，冯玉祥又在说假话了！

九

冯驻开封时，洛阳西工是他的军事学校集中地。这里有初级军事学校、高级军事学校、各兵种专业学校，等等。

一次，冯到洛阳公毕离开时，各校学生列队欢送。冯从每一

队前走过，看看他们的精神面貌。走完又回到其中一队前面，叫他们全体坐下，脱去鞋袜，伸出两脚。全场为之惊异。这时，冯从衣袋中掏出一把剪刀，蹲着给学兵剪脚趾甲。一边剪，一边不住地问：“你的脚趾甲长了这么长，多少天没剪了？”或者问：“你的脚这样脏，几天没洗了？”等等。当时他的夫人伴随在旁，很风趣地插话说：“你还说他们，你自己的脚趾甲够长的，脚也够脏的了……”冯同样有趣地答道：“是的，我还有你来关心我，他们有谁来关心呢？”

他说：“今天我给几个弟兄们剪脚趾甲，将来又会有人指手画脚地说：冯玉祥又在作假呢！是的，我不能给我军每一个弟兄剪脚趾甲，但是，我要提醒你们各级官长，尤其是排连长要特别注意。你们应该关心自己带领的弟兄的一切生活，不仅要关心他们的吃穿，更要关心他们的清洁卫生。大家想想看，弟兄们离开了家乡，离开了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谁是他们的亲人？你们天天生活在一起不关心他们，还有什么人关心呢？官长就是他们的亲人。如果官长不以亲人看待他们，他们又怎么能不思家念亲呢？剃头、洗澡、修指甲等等，都是小事，但我们不能看作是小事，事实上也不是小事，它是生活的一部分，对身体的健康，对军容实力的影响，都有很大关系，而且更表现了官长对弟兄们是否关切！”

最后，冯高声问道：“冯玉祥是在说假话吗？”“不是！”“冯玉祥是在做假事吗？”“不是！”冯于是噢了一声说：“只要你们不认为冯玉祥在作假就行了！”

十

冯玉祥在群众性的大会上讲话时，常在有意无意之中借题发挥，指桑骂槐。有一次他在讲话中插入这样一段话：“现今世道，

不讲什么‘人道’‘不人道’了！现在的世界，是‘霸道’的世界，是‘横行霸道’的世界，是你抢我夺的‘强盗’世界。处处有‘马道’（马路），没有‘人道’（人行道）的！就拿开封来说，最好的也还是‘马道’（开封当时最好的一条路，也是最热闹繁华的一条路，是相国寺东边的‘马道街’）！‘人道’不如‘马道’！”

十 一

冯玉祥某次在集合部队讲话时，好像心有所感，因而一开始就用极不平常的语调问道：“弟兄们！现在有人说冯玉祥是个‘大军阀’！你们说，冯玉祥是不是一个‘大军阀’——？”全场高声回答道：“是——！”这个出人意料的答声，弄得冯玉祥下不了台。怎么办呢？冯不动声色地站着不动。稍停一会，他用不很高的声音，不是问的口气，而是自言自语的口气说：“噢——！冯玉祥——还是一个——大——军——阀！”这时又应声而起：“不是——！”冲破了短暂的沉寂的空气，活跃了全场的人群！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大笑话呢？由于部队惯例答话是用简音的“是”或“不是”。那时的讲话，既没有扩音器，又在讲话的开始，会场还没有安静下来，话音也不是很高的，因而士兵也没有弄清楚，就不自觉地答个“是”，弄得全场各级官长都下不了台，又由于冯的应付得当，转变了空气。

接着，冯玉祥讲了什么是“军阀”？怎样就不是“军阀”？才结束了一个啼笑皆非的场面。

十 二

冯玉祥对部队的学习很重视，因而经常鼓励士兵学习。他发给每人一只背包，随身携带应读的书籍和用具，以便随时随地学

习。一般士兵学的是识字课本、冯总司令语录、三民主义问答等等。高一级的官佐学的是三民主义、曾胡治兵语录、总司令语录之类。总部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也不例外。他还制定了一些学习制度，例如在吃饭前和睡觉前，一定先学习5分钟到10分钟，或是认识几个字之后才能吃饭或睡觉，以表示读书和吃饭、睡觉是同样或更为重要的。

冯在一次鼓励士兵们要认真学习上的讲话中说道：“现在你们的官长都希望你们学习，领导你们学习，发给你们学习的读本和用具，给你们定出学习时间，你们为什么不好好学习呢？我在当兵时，和你们今天是大大不同的。官长固然不领导学习，不给学习时间。自己有时自学，官长和弟兄们看见了，不是讥笑你，就是挖苦你，使你啼笑皆非。那时我经常偷偷地在夜间学习，在住室墙壁上挖个洞，小小油灯放在里面，书就拿在洞口外边，一则为了看清楚；二则为了遮避灯光，不妨碍大家睡觉，更不会使弟兄们知道。但是，一天夜间一个弟兄起来小便，见我正在学习，当时虽没说什么，可是第二天，他就当着我的面对许多弟兄说：‘冯玉祥夜间在用功，想升官，想当班长；班长有缺时，还不是冯玉祥顶补吗……’大家一齐哄笑，弄得我无地自容！”

韩复榘当河南省政府主席时，冯驻洛阳。有一天，冯命令调韩复榘最精锐的手枪队去洛阳，韩不肯从命，冯大为震怒，即派总部大员某人（据说是参谋长李兴中）亲去开封，把韩复榘叫到洛阳。韩见冯时，脚上穿着一双新皮鞋（有的说是礼服皮鞋）。冯就从鞋上开话，说：“你的这双鞋很好呀，新买的吗？价钱很贵吧……”接着就说：“你现在当了主席，吃穿都很讲究，在家有人守卫，出外有人保驾，事事都很威风了！我在这里，没人管

了，连守卫的人都没有？好啦，请你去给我站门岗守卫吧！”韩本是在冯的家长式的教育下成长起家的，这时他虽满肚子气愤和恼火，但敢怒而不敢言，只有乖乖地走到司令部门外执行站岗任务，直站了两三小时。经一些高级人员再三请求，冯才饶恕了韩复榘。

1929年，冯军由开封西撤，韩复榘行止黑石关，掉转东去，背叛了冯玉祥，投靠了蒋介石，有人认为与这两个钟头的门岗是不无关系的。

一天下午，冯在陕西华阴驻地办公室接到一份电报，大吃一惊，怒气满面，默不作声。少顷，大呼拿绳子来。左右人不知何用，不敢不拿。这时，冯一面伸出自己的双手，一面喝令：“把冯玉祥绑起来！”这真吓坏了左右的人。他们服从命令就得动手“绑”，不“绑”就是违抗命令，真叫左右为难了！他们只有垂手而立，俯首不语。冯再三喝令绑！绑！绑！但他们只有抗命到底。这时，冯向地下一坐，用自己的双手乱打自己的脸，气愤而又哭泣地说：“冯玉祥不要脸！该打！该打！”一些高级人员前来劝解。冯说：“冯玉祥太丢人了，几十年教育出这样的部下，自己应该负责，不加惩罚，还有什么法纪呢！……”他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原来是因为韩复榘的叛变。关于这个消息，冯已有所闻，但他决不相信。自信他的所有将领都是他几十年亲手教育提拔的，一向管束很严，怎么也不会叛变他的，因而认为是谣言，是传说，绝不是信的。这天来的电报，证实了不是谣传，而是真的。冯对此事感到万分痛心，感到家长的威风丧失殆尽，对其他将领是否忠诚也已丧失信心。经人劝解，怒气虽然稍平，但坚决要记“冯玉祥大过一次”，以示薄惩！

（全菊圃）

孜孜不倦读书

冯玉祥的一生，求知欲很强，刻苦读书，是他突出的一个特点。冯幼年失学，从入伍当兵起才开始读书。在那个时候，能突破旧军队的恶劣环境，手不释卷地努力求学，实在不是一件易事。由于他的读书不是在学校里，而是在工作当中，不知道就想学，学了就想用，对思想的变迁起着直接的影响，从而支配着他的行动。现在把我所接触到有关冯读书的一些事记述出来，以供研究冯思想变迁情况者参考。

我于1927年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即到冯的陆军检阅使署任参谋。他们一师三旅人，均集中地驻在北京、南苑和通州一带，两年中没有什么调动。那是西北军大练兵的一个时期，除了健全军事教育的各种设施外，还大力提倡业余读书活动。他自己读，也叫士兵读，更督促官佐们读。每个单位均组织有读书会，不时加以考查，不努力的，时遭冯的斥责，有的人为了应付冯的考查，将规定读的书胡乱圈点一番，冯一看圈点过了，认为是读过；也有人读到不耐烦时把书本一丢，说声“不给你读了”！认为读书是给冯读的，笑话百出。

冯时常对我们讲述他幼年失学，不认字等于睁眼瞎，十分苦恼。那时旧军队里官兵识字的很少，谁要想识几个字，全骂你是官迷，不但把书本抢走，还说：“想当官儿不在这个，还要祖上有德。”自般的讥笑。他还谈到应该读什么书，说他初读只知开卷有益，不知该看什么书，竟看些《封神演义》、《施公案》、《彭公案》一类的小说，后来渐渐知道看这种书对自己没有好处，听说《三国演义》是好书，他就迷上了三国，看过几遍，所以提起三国上的事，他最熟悉。后来，朋友们劝他多读正书。他在看纲

鉴、列国之类书时，感觉很为难，请教于老友邓长耀，邓教他读古文，获益不少。他喜欢看文字浅近的少年丛书、中外名人事略等书。他常对官兵们讲这类故事，说：“英雄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军人要有大将风度，这种修养，要在书本里求”、“饭可以不吃，书不可不读”、“土三日不读书，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这是他常用以勉励人的几句话。

在当检阅使以前，他一般就学于军中的秘书、书记或秀才、教书匠出身、有相当文化的人，仍感觉不够，乃到南苑专门请了几位老师：一位是王瑚，字铁珊，前清翰林，当过江苏省长；一位是陈明，字主欽，是陈参谋长琢如的父亲，还留着小辫子，专攻理学的；另外还有一位姓张，记不起名字了；还有沙明远等，替他讲经书和子书、史书等，如《论语》、《书经》、《易经》、《群书志要》等等。他人了门，就介绍给营副以上军官们。我选修了《孙子兵法》、《易经》两种，《孙子兵法》由王铁珊主讲，易经由陈主欽主讲，每周一次。冯还买过许多旧书分赠给高级军官，所以很多人的书架上均陈列着线装书，有的是冯送的，有的是自己买的，有的是摆样子，也有的让书记官替他讲，上行下效，相习成风。我们的读书会由石敬亭领导，他分赠过我一套《资治通鉴》。所以，西北军的将领们尽管文化水平不高，但无论到哪里，对于有旧功名的读书人，一般是很尊敬的。

宋哲元在冀、察政权时期，命财政部印刷局印了许多《四书类解》，分赠部属朋友，一度恢复保定莲池书院，提倡就学；闻丞烈翻印过几万部《李二西全集》，分送知友。这不能说不是受冯的一定影响。王瑚随冯最久，冯到张家口，保荐他任包宁铁路督办，铁路未修，还是为冯讲学。五原誓师到人甘援陕，王均与冯同吃同住，直到冯在张家口抗日时，十几年始终在冯身边，与他半师半友。冯在《我的生活》中写道：“铁珊尤能言语有则，

潜移默化之间，予我和全体官兵以极好的熏陶”、“我以为新文化尚未普及以前，中国经书、易经最为主要，是中国哲学的一部大著，王、陈、张三位先生各讲过一篇易经，驻南苑期间，易经共讲四遍。”大家均认为，对冯一生影响最深的人有两位，一位是王瑚，一位是李烈钧。李始终以反共而拉冯拥蒋，如1927年北伐中冯的拥蒋反共，就是李派彭程万去西安说服冯的。1936年冯在泰山听了李的劝告，才力排众议，赴南京去团结抗日的。至于王瑚，则是以旧封建意识来影响冯的进步。如北伐时在西安，妇女协会曾提出“反对贤妻良母”的口号，而王瑚竟抓住这一点对冯说，我不懂这是什么意思。冯于是到处讲，我不懂为什么必须做恶妻坏母才是革命。到后来，冯也明白了他在读书中所发生的毛病。《我的生活》中有这么一段：“但读书不可迷信，尤不可拘泥，可惜我那时读它，不免过于崇信，以致待人处事都受其影响，如易经谦卦中三翻四覆说的一个谦字，使我总以为消极退让是人生最大美德，因而对政治不能处以积极态度，其实这并不是书的不对，而是我自己的错误，我以为对人处事，固尚谦让，但对国事，对政治，却必须有一种当仁不让、积极负责的精神。”这是他针对在北京政变后，将政变成果拱手让段（祺瑞）；在北伐完成，蒋以华北给阎（锡山），而他未予力争的一种追悔。

冯在西北军瓦解以前的十几年当中，旧书读得比较多，新书读得太少。1925年以后才涉猎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建国方略诸书，对于革命理论了解得太少，正如五原誓师宣言中所说：“我对于革命，只有笼统的观念，没有明确的主张，革命的主义，革命的方法，在从前都没有考察，所以只一两点改革式的革命，而没有彻底的作法……就革命观点上说，过去，若说是个中国革命者，是一个中山主义者，我都不配，至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与世界革命的话，更说不上。”冯在北伐中到

达西安，处在国、共分裂的时候，一遇到党务纠纷，他每每提到“我是个初上跳板的国民党党员”不知如何处理，囿于阶级本质，终至失迷了革命方向，执著于团结对敌，否认消极势力的存在，竟至认敌为友，与新军阀蒋介石合流。在西北军瓦解以后，他才逐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开始研究社会科学，请人讲授进步书籍，这对冯晚年的思想转变起到一定的影响。关于冯在汾阳，在泰山，在南京，以至在重庆读书的情况，已另有人写过，我不多谈，这里只想讲一点。1930年西北军瓦解后，冯的一些下属们均闲居在天津无所事事，冯指示大家组织读书，我和张吉墉、傅正舜、李忻、陈继尧等，在陈继尧家组织了个读书会，冯给我们介绍了几位老师，其中有革命投机分子陶希圣，替我们讲经济、历史；鹿钟麟、石敬亭、孙良诚等在天津谦牲银号，也请了一位老师（姓名记不清了）讲《资治通鉴》。听说冯在泰山，除了请人讲进步书籍外，还有位范明枢老先生讲春秋、左传。冯曾出版有《左传札记》一书。那时，冯的读书依然是新旧都有，这也影响着人的思想。

现在我回忆起有关冯读书的几个例子，以说明冯读书的一些情况。

1928年春，蒋、冯联合进行二次北伐的时候，我从日本回来路过南京，薛笃弼对我说：“总司令（指冯玉祥）叫我替他买了几万本《新土耳其》，急着要，请你带回去。”我答应了，待把书送来，一看几大包，我只身一人，感觉很为难，恰巧驻京办事处的人说：“我们有个车皮，挂在你这列客车上，可装在那个车上，免得你自己带。”我说好极了，并不知道这个车皮是挂赴郑州的。我到开封下车见冯，汇报工作后，冯问我薛部长让你带来的书呢？我说在车上，待派人去取，不料车皮已挂赴郑州去了。冯的总司令部在郑州，连忙向郑州打电话，请派人立即将书送

回。这时，第一、二集团军正分路北进，冯命我赴道口组织前方指挥所。两三天后，冯也到了新乡。我接到传令员刘纯德的电话，问：“总司令问你给他带来的书呢？”我说：“在开封时已与郑州吴参谋打通电话，叫他马上把书送往开封，怎么还没有见到呢？请你问问吴参谋吧！”孰知冯即在电话旁边，刘回答我说：“总司令说，书他不要了，全送给你了。”我还诙谐地说：“我要不了那么多，只要一本就行了。”刘说：“总司令说，你要不了可以卖呀！”我知冯在生气，对刘说：“我负责问郑州，明天一定把书送到。”挂上电话，直忙了一夜才把问题搞清，在郑州派人把书送到开封时，冯的专车已由开封开走，所以未收到。几天之后，冯给我带来一本，他在书皮内页写道：“我急着要这本书，请你从南京带回来，不知你把它带到哪里去了。你又忙着去前方，我一直找不到，怎么不着急呢？现在送给你一本，从头到尾看一遍，就知道此书的重要了。”这本书是写凯末尔复兴新土耳其的功绩，冯看中了，买了几万本，要分赠各高级将领读的。通过这件事，可以说明冯在当时所崇拜的人物和他的思想情况。

另一件是1928年冬冯、蒋破裂的前两三个月，冯在南京，总参谋长石敬亭赴山东（山东主席孙良诚，未到任前由石代），我以参谋长的名义留在开封，负责处理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的事务，突然接到冯的电报，命在郑州为蒋介石建立铜像。这个电报是给我和河南代主席邓哲熙的，于是我们共同研究，一方面感到给活人立铜像还没见过，另一方面想到中国这些年来，许多头面人物常常今天你兄我弟地亲亲热热，保不定明天就会你匪我贼地干起来；盖棺尚不能论定，人活着就立铜像是否合适，煞费踌躇。可是冯的脾气我们都晓得，你不着手办，明天就会有电来追问，谁也担不起，只有筹划着派人赴平、津或上海，找这种技术工程人员。恰好石敬亭由山东回来了，于是问他怎么办？他直接

了当地说：“立起来还容易，将来怎么样推倒呢？”我说：“搁起来不办行吗？”石对我说：“你去南京，对总司令说说，暂缓一缓。”我说：“准碰个大钉子，我不会说。”石说：“你就说这是我们大家的意见，立铜像需要派人赴平、津或上海去找人，一下子办不成，为了使全军信仰蒋总司令，可先印发一批相片，铸铜像等找妥人再说。”我不好不去，便硬着头皮到了南京，照原话对冯一讲，他哈哈大笑，接着说：“你回去对石参谋长和邓厅长说，吃喝嫖赌赵匡胤，黄袍一加身，就是大宋的几百年太平天下，人民百姓都受其益，我看蒋总司令是当前中国的一个人物，你告诉石大先生和邓等，别在那里一吊钱压在大杠上（赌博压宝名词）想三想四啦！”我一看不行，不敢再说别的。出来之后，我去找秘书长魏书秀，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还不是读书读来的吗！总司令有一天读英文百科全书，读到外国有人为一个活着的人立铜像，在落成的那天，邀请本人参加揭幕典礼，他老先生感到很新鲜，就要照样来一套，给谁立像呢？当然想到蒋介石，马上便叫我给你们打电报。老先生一高兴，真是没有准口，我也不赞成，哪敢扫他的兴呢！你和他谈得怎么样？”我说：“还不是未说通。”我回开封向石等汇报了经过，石说：“过几天再说吧！”未想到以后冯并未来电追问这桩事。不久，冯、蒋果然翻了脸。次年春冯就回到河南，布置全军西撤，真干起来。这件事也说明冯是那么好冲动，幸亏铜像没有立。

再就是1929年秋，冯在山西被阎软禁在晋祠，我应鹿钟麟的电召由陕西赴南京，过太原去看他，正赶上他在上课，也留我一同听课。老师是李泰兰，讲的什么书记不清了，讲完之后，比今喻古地谈论一番，读书人也借题发挥，表示自己的政见，引得冯又大骂蒋介石不止。我听着不顺劲，一言未发。出来之后，我对冯驻太原办事处处长陈继淹说：“我看老先生这种读书法，越读

毛病越大，不如不读好。”我所以发牢骚，是因为不同意读书人这种讲法，这种讲法更加深了冯的主观和冲动。那时西北军西撤以后，衣食无着，人心惶惶，正设法和蒋介石靠近，一方面骗取一点接济，一方面联蒋对阎，好使阎无法居冯为奇货，以解救冯的被困，希望冯暂时忍气吞声，别犯急躁，而讲书人不仅未制止冯，反煽风点火，使冯急躁得更厉害。陈继淹说：“他老先生一生如此，现在更不听旁人的话了，时常发脾气。”我到南京，鹿钟麟已就军政部长，叫我任总务厅长。和蒋拉得情况很好，允接济100万元，棉衣、白面装了几列车，星夜而运，未想到款还未领齐，领运的东西也未过郑州，冯又受了阎的欺骗。虽然发动了护党救国军以讨蒋，而阎并未出兵，这一来打断了与蒋的联系，不但加重了西北军贫困和内部的不睦，而冯更失掉一次获得自由的机会。这件事虽然与冯的读书关系不大，但对冯的读书与应用从中可见一斑了。

(吴锡祺)

我的求学记

244 大约是在1932年的五六月间的一个星期天，我正走在回校的登云街大道上（登泰山必由之路），忽然，静静的街上传来喊声，我立刻躲到路旁的一个门楼下观看，心中想着不知又是什么大人物上山来游览。不一会儿就看到几辆滑竿路过我的面前，我仔细看，啊！这坐在第二辆滑竿上的人，不正是我崇敬的冯玉祥将军吗（我见过他的画像）！与此同时，从路旁的人群中传来了一阵欢呼声：“冯总司令！冯总司令！”只见冯还向他们招手致意。我用力睁大双眼，死盯住走远了的第二辆滑竿，直到连影子也望不见啦。这时街上行人如旧，有的在互相谈论着冯的到来，

我所知道的冯玉祥

我却呆呆的倚在门楼的墙壁上，心潮翻滚，思绪万千。

几天来我只觉得坐卧不安，决心上山求见并求助冯将军。但临到头上反而疑虑重重，有些胆怯了，思想斗争十分激烈。最后还是下定了决心，鼓足了勇气上泰山云见冯玉祥。

经过打听，知道冯就住在泰山上的普照寺内。寺院座落在泰山腰偏西的一个风景区。远离这登山的大道。据说寺内禁游，四周戒备甚严，游人不得走近寺院，更谈不上进到寺内。我不由得联想到经常有大人物到斗母宫（尼姑庵）游览的戒备情况，那真是内静外戒，威风凛凛，杀气腾腾，谁敢走近？想到这些我凉了半截，觉得希望渺茫，但我再仔细的考虑了一下，坚决要上，普照寺的地形我还熟悉，便决定充当挖野菜的女孩，沿着后山的小道前进，遇到人影就蹲下，没有情况就疾步前进。我在一个星期日的上午，写好一封求见信藏在内衣，从小道朝着寺院后侧慢慢溜近，忽然看到山下的各条小道都有行人来往，并不像传说的那样森严可怕，我这才舒了一口气，胆子也大多啦。急急忙忙走近了寺院的后墙，刚走到拐角，两位哨兵就发现了我，其中的一位迎了上来，问：“你哪里过来的？”我见他们的态度并不凶狠，又都没有背着枪支，胆子也就大了，就很有礼貌的照实告诉他们，“是从后山沟抄小道溜过来的，我要求见冯总司令”。哨兵面无表情的朝着我上下打量，然后淡淡地回答说：“冯总司令不在家，外出访客去啦……”我不相信他的话，立刻很严肃地说：“不在家没有关系，我就坐在这里等，如果他从外面回来我就求见，如果他从家里出来，我就要告你们撒谎。”那位哨兵朝着另一位哨兵递了个眼色说：“你进去看看总司令是否回来啦。”然后又皱皱眉头问我：“你有名片吗？”我急忙从内衣里掏出了早就准备好的那封求见信递给他：“请你把这封信带上去”。他接过信后，反正地看了看，又捏了捏，就递给了那位哨兵，并温和地指给我一

块大石板，让我坐下等，我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在等待，不时朝寺院的大门里探望。

不一会工夫，那位哨兵叫来了一位穿便衣的通讯员，指着我对他说：“就是这个小姑娘。”并转身对我说：“你跟着他进去吧。”当我转身向两位哨兵表示谢意时，正巧碰上他俩含笑的目光。

我跟着他一直走进内院，东厢的一个大房间，冯夫人正坐在那里看我的信，看见我进来，上下把我打量了一番，就让我坐在她对面的一个杌子上，通讯员给我倒了一杯开水后离开了。这个房间就是冯的寝室，房里的摆设十分简单，墙上挂着很多字画，好似临时挂在那里看的，不知是他要送别人的，还是别人送给他的。有两张我们山东式的大木床，床上叠放着被枕。在几张大方桌上，堆满了书籍和纸张，此外就再也看不到什么引人醒目的东西了。冯夫人对我表示歉意说，“冯先生在那边同客人谈话，不能接见你，让我来代替他接见……”在我们谈话刚开始的时候，我感到很拘束，把早就准备好要说的话忘得干干净净，低着头坐在那里，她问什么我就回答什么，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直冒汗。就这样问答式的对话继续了一会儿，还是她逐渐设法才把气氛活跃起来。逐渐地我们越谈越热乎、越自然，她望着我，我也望着她谈，就这样我越来越大胆、越随便，竟使我忘记了自己是身在何处。在我们谈话的中间，不时地传来冯先生同客人们在西厢房高谈阔论的声音，甚至有时是激昂陈词。冯夫人有时侧身倾听他们在讲些什么，我听不清也听不懂。就这样我们谈了很长的时间，最后冯夫人对我说：“你先回去吧，我同冯先生研究一下再答复你。”就这样结束了我们第一次的谈话。

大约过了十多天的时间，突然校办公室叫我去。当我走进办公室时，看到几位重要的领导都坐在那里，同时都用一种不寻常

的日光望着我走进去，女校长首先开口问话：“你认识冯总司令吗？你同冯总司令是什么关系？”我被这突然的问话吃了一惊，一时不知应该如何回答才好，略为迟疑了一会才慢吞吞地说：“不认识，什么关系也没有。”她立刻从桌上拿起了一封早已被他们打开了的信交给我说：“冯总司令叫你这个星期日上午10时到他那里去一趟。”接着就是一阵好奇的追问。

到了星期日，我按照约定的时间上了山。上次见到的两位哨兵见到我，他让通讯员领我去见冯夫人。见冯夫人正在整理东西，我忙走过去帮忙。冯夫人歉意地说：“真不巧，冯先生又来客人啦，我俩边干活边谈话吧。”态度和蔼，自然融洽，好似在自己家中一样。中午时刻，通讯员进来通知她去吃饭，我便主动告辞，她很诚恳地留我一起吃午饭，我只好跟她走进了饭堂。

吃饭的桌子是用三条长桌拼起来的，两边放着些长条凳和杌子，那天的主食是油饼，喝的是麦片粥。刚刚坐下，便听到一阵谈笑声，我抬头看，是冯先生领着几位客人来用饭，便立刻站了起来，这时冯夫人指着我说：“这就是杨荷亭女士。”冯先生面带笑容地看了看我说：“请坐，请坐，不要客气，请用饭吧。”说完他就连忙招待那几位客人坐下，然后他坐在冯夫人的身边也就是我的正对面。只见他态度严肃而不令人生畏，有时和蔼而又令人肃敬，步伐稳、健、慢，声音沉着有力，目光锐利，身材魁梧，身穿便服，脚下是布底便鞋，神情自若，等大家都坐定后，他们夫妇忙着为客人盛粥夹饼。我心情激动地盯着冯先生同客人讲话，这时我的脑海里浮起了一幕幕回忆，从我幼年时期起一直到今天，听到过多少关于冯玉祥传奇般的种种事迹。他巍然坐在我的面前与我同桌共餐。他好似感觉到了我在注视着他，猛然间他转向我说：“小姑娘别捧着个碗光喝稀的，要吃饼就菜呀”。说着就来了一大块饼放在我的面前并同我谈起话来。“要好好读书，

将来对国家对同胞要成为一个有用的人……”虽然我初次同冯谈话，却感到很自然。吃过饭，冯夫人满面笑容地对我说：“冯先生已决定答应你读书的要求，他将负责你全部的费用，希望你好好地用功读下去，你现在回校去吧，等你放暑假后再来见我。”就这样，我这个穷孩子又回到了山东泰安德贞中学继续读书了。

一放暑假，我立刻上山去见冯夫人。她亲切地拉我坐在她的身边说：“冯先生想让你到山西汾阳铭义高中去求学，那里的校长是余心清，是冯先生的朋友，所有你的一切用费，包括生活上的费用冯先生全部托付了余校长负责，你一定要在秋天开学之前赶到……”她停了一会儿说：“路途是很遥远的，你自己敢去吗？”我说“敢”。

然后她取出一个小包袱，对我说：“冯先生让我给你找了几件旧衣服，我穿着太瘦啦，你改改穿吧”。原来我三次上山都是穿着我自己染蓝的唯一的、只有出门才肯穿的大褂。这些微小的事情，他们都注意到啦。

冯夫人又取出了50元钱，放在我的手里说：“这是你去山西的路费，是很有富余的，要收好，多藏几个地方，沿途要当心……”她好似送别女儿似的，叮咛了很多话，我非常感动。自从11岁失去了母亲，我再未享受过这样的亲情。我尽力克制自己的眼泪不使它流出，头也不敢抬。房中的气氛沉寂了很久，最后冯夫人站起来扶着我的肩膀说：“回去吧，祝你一路平安，到达后来信……”我仍然夹着那个小包袱，呆呆地站在她的身边，脸扭向了墙壁，冯夫人低声问我：“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我快要哭出声来，说：“我要谢谢冯总司令，我要告辞冯总司令。”她立刻握紧了我发抖的手，低声安慰我说：“不必啦，你听——他正在同客人谈话啊！要记住他在吃饭时对你讲的那些话，以及对你的希望，别辜负了他就行啦……”就这样我离开了他们。

下山的时候，我曾多次停下脚步遥望着冯玉祥夫妇居住的寺院，任眼泪一串串地流下来。

后来我在山西铭义高中读书时，冯将军委托余心清校长负责照顾我，当我在山东济南齐鲁大学读书时，他又委托女子部主任刘兰华负责照顾我。每当一学期结束时，我总要把这一学期来的学习、生活以及各方面的情况连同成绩单向冯将军作详细的汇报。他每次收到汇报信，都给我回信，对我各方面的成绩表示满意，并加以鼓励。从回信中可以看出是由他的秘书代复的，但信后落款的“冯玉祥”三个大字都是他亲笔所题。将军在百忙之中还这样细微地关心着我，真是令我终身难忘。

(杨荷亭)

“平民将军”的生活

冯玉祥在他一生中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对于曾国藩是极为崇拜的。他不但在治军方面受了曾的很大影响（曾经把蔡松坡编的《曾胡治兵语录》作为治军的金科玉律，并将这本书定为部属的必修读物），而且在思想作风乃至生活作风方面也表现了对曾的敬仰和效法。曾国藩曾以转移社会风气自命，在他一篇题为《原才》的论著中，认为只要由少数有地位的人以身作则地为天下倡，就可使社会风气得到转移。冯对这个说法极为心折（有人持宣纸求冯写一条幅，冯即摘录《原才》一文赠之）。又由于他总想在社会上留一个好名声，因此，除了表现在其他方面的以外，也想在转移社会风气方面由自己作出个榜样。在今天，要想把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的全貌描画出来，除了将他的重要活动记录下来之外，对于他的日常生活也有加以叙述的必要，虽然这些看来似乎是十分琐屑的小事，但是由这些小事也能表现

出他的性格和作风。

冯玉祥的日常生活，在衣食住行各方面，往往表现得很特殊，引起了不少人的议论，有人说他是“矫揉造作，不近人情”；有的说他是“立异为高，沽名钓誉”；并且有人说他“外边穿的是粗布衣服，里边套的是狐狸皮袄；请客时吃的是粗茶淡饭，在家里净吃鸡汤，故意装相”。很多人都认为冯玉祥这个人太假，令人莫测高深。但是也有一些人，特别是跟冯在一起很久的人，常常替他分辩，认为他的生活确实是艰苦朴素，并且说：“你说他假，他几十年如一日，假到底也就是真”。众口纷纭，在这里不想再作评论，只是写出他的一些事迹以供参考。

先说他的穿衣。他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在他当中、下级军官时，和其他人一样；到当旅长的时候，也穿过长袍马褂，还制过一件貂翎眼的皮大衣，在当时是相当名贵的。到当了师长之后，才处处表示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一年四季，经常是灰布军装、青年鞋（有时穿皮鞋或马靴），打裹腿，和士兵的装束一样。他的部队里禁穿毛呢军装，但团长以上的军官却都有大礼服，以备参加庆典时穿用。1918年驻兵常德时，曾下令军官佐不准穿长袍、马褂（主要是怕他们穿了便衣出去吃喝嫖赌），所属文官及出外办事的军官一律穿灰布武装便服，但有的人还是偷偷地穿便衣。在当时，其他部队的高级军官和手头富裕的中下级军官都讲究穿呢制军装，出营时均换便衣，相形之下，冯的军队就显着很特别，有些人因此不愿到冯那里工作。

冯玉祥最反对华丽的衣着，被他看到时，当场予以难堪。军需李隆九穿了一双缎鞋，被冯遇见，冯马上给这位军官敬了礼，吓得他不知如何是好。冯说：“你不要误会，我不是给你敬礼，是给你那双鞋敬礼。”这件事顿时传为笑谈。有一次冯住在北京香山饭店，发现室外衣架上有一顶漂亮草帽，马上问是谁的，他

的儿子洪国说：“是我的。”冯说：“呵！好混账的草帽！”像这一类的事很多。外边的人去见冯常常是换一套比较朴素的服装再去见他。如冯在陕西时，省长刘镇华的生活本来很腐化，但为了与冯打交道，特意制了一套布料武装便服；冯在南苑时，当过外交总长的王正廷，为了去见冯，也制了一件布大衫，因而有人讥笑他要钻冯玉祥的门子。

1925年冯到张家口任西北边防督办，由于兼管军民两家，和社会上的接触便多起来。除了察看军队之外，不常穿军装，平时总是灰布武装便服，上行下效，他的部属当然就成了一片灰。有一次他请地方绅商吃饭，谈到地方商业情况，有位商会会长说：“自从贵军到后，我们这里就糟了。”冯惊奇地问：“这是怎么回事呢？”会长说：“张家口这个地方是内外蒙的通商口岸，进口大宗是皮毛，出口大宗是绸缎，这里的商业贸易原是很繁荣的；可是自从贵军来后，因为禁穿绸缎，市面已日渐萧条，地方税收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冯当即解释说：“我并未禁止穿绸缎呀，只是怕我们的青年军官学浮华，不要他们穿绸缎，至于老人们，还是可以穿的呀。”冯为消除这一误会，开完会就派人买了100多匹春绸、几十件老羊皮袄，分赠全军上校以上军官佐的父母，以示提倡。从这以后，官佐家属也渐渐有穿绸缎的了。

1926年冯出国赴苏联时，破例穿起了西装。半年以后，由苏联回到绥远的五原。那时西北军在南口和晋北打了败仗，弄得丢盔擐甲，衣帽不全。他要亲自出马去抓他的军队，由苏联穿回来的西装当然要放一放，找来几套质料比较好的衣服全不中意，最后看中了一套士兵穿过的旧军装，便穿在身上，因他身量大，上身仅到腰际，怕风吹，外面扎上一套布腰带，那个样子很难看，他却说：“好极了！”坐上汽车便驰往包头召集部队讲话。人甘援陕时，到处布匹缺乏，部队的服装无法补充。在西安拟先补

充一批军帽，但又买不到铁丝做上圈，最后只好做成一种软胎的军帽。总部队员以帽子的样式难看不愿戴，冯却以身作则地戴起一顶，大家才慢慢戴起来，不过外人看着还是不顺眼。夏天每人发一顶草帽，作战时为减小目标，罩上一层绿油布，人皆称之为“绿帽子军队”。从此官兵全一律穿士兵服装。冯在南京任行政院副院长和军政部长时，也是穿的这样的服装，曾经引起了那些高官大人物的反感。

中原大战失败后，冯经过一段山居的生活，便改穿粗布短衣，近似农民装束。九一八事变后，他赴南京出席国民党的四届一中全会时，就穿着这套衣服。当时参加会议的人，有的穿中山服，有的穿长袍马褂，有的穿西装，惟有冯的装束最为特别，成了大家的谈资。随冯来的人便劝他说：“您这次来京，是为了团结合作，共赴国难，人家规定的制式礼服是长袍马褂，而您偏要穿一身小打扮，在这点小事上都不能迁就，还怎能谈得上团结合作呢？”冯当时未置可否，有人去找他的好友李烈钧，由李出名送给冯一套长袍马褂的布料，冯在接受时说：“就依着你们办吧。”马上找来缝工量尺寸，冯说：“不用量，就照着张秘书（秘书张锋伯也是个大个子）的身量做吧。”第二天做成请他试穿，还未打开看一看就说：“棉袍太长了。”缝工说：“您还没有试一试，怎么就知道太长呢？”冯说：“我说太长，就请您给改一下吧。”缝工问：“减多少？”冯说：“长一尺。”说完他就走开了，弄得缝工莫名其妙。还是冯的随从说：“请你不要为难，就给截去一尺吧。”这就是他在南京所穿的那件式样奇特的礼服。事后冯对人说：“中国有四万万人口，如果每人穿长袍都短一尺的话，就可以省下很多布匹，为什么非要那一尺不可呢？”

冯为了穿他所穿的衣服，还有过这类的趣事：他在山西绛州住的时候，喜欢穿当地出产的土布；以后迁居汾阳至道河，曾不

止一次地派专人乘长途汽车去绛州购买土布。还有一次是在南京，因为找不到他要穿的那件特制的内衣而大发脾气，副官处只好派专人到开封去取。

其次，冯在吃的方面，也俭朴。他在南苑当陆军检阅使的时候，他的小厨房，每月限制支用菜钱12元，冯亲自查账，不许超支。但吃的太差了他的夫人又不高兴，而且来往的客人很多，12块钱一个月绝对不够，管伙食的人很为难，只好由军需处暗中补贴，还不能叫冯知道。

1923年5月7日，冯为纪念国耻，照例举行“攻打日本”的军事演习，邀请北京政府许多官员参观。中午在演习场地野餐，每人分给几个印有“勿忘国耻”四字的窝窝头，一块咸萝卜，一碗凉开水。冯对来宾说：“今天是国耻纪念日，我们在这一天不动烟火，全吃冷食，表示卧薪尝胆的意思，对不起各位，改天我再请客。”有的人勉强吃一个，说些奉承的话；有的人只吃一两口，饿一天肚子回去，大骂冯玉祥作弄人；而他自己却能吃两三个，而且吃得是那样津津有味。冯在张家口请部属会餐，吃的是小米饭，有位道尹邓长耀当场赋诗，有“大家同吃小米饭，总司令说分外香”之句，冯对邓诗很欣赏，很高兴。

1926年9月，在绥远五原誓师参加北伐的时候，因为那里很荒凉，大军过境之后，情况更苦，每天只能吃到两顿粗糙的小米饭，没有蔬菜和肉类，因此五原县长刘必达给冯送去两只肥鸭，冯却打了他20军棍，还骂他不设法给军队筹办给养，专会奉承上级。

不久，到了西安，因为解围不久，军队给养更为困难，总司令部人员都吃大锅饭，每人半碗菜汤，称之为革命饭。参谋长秘书长和各处长每日在冯那里集体办公，回来之后，饭菜已冷，有次秘书长何其华在骂街：“就是养个牛，也得把它喂好呀！”传达

员向冯汇报，冯说：“听说大家办公回去赶不上吃饭时间，以后办完公就在我这里吃吧。”冯吃的也是大锅菜，可是油水多一点，也很热，大家吃起来很满意，将饭菜一抢而光，弄得冯常常吃不饱。后来，由军医处长提议，另起锅灶，专为各处长热饭菜，才解决了问题。

冯最不高兴彼此应酬请客，更反对下馆子吃酒席。有次赵守钰（刚到西北军工作不久）请总司令部处长以上人员吃饭，事为冯知，他计算好时间请赵谈话，故意把话题拉长，不放赵走，客人们在饭馆等了很久，因为主人不到，这顿饭竟没有吃成。所以后来谁也不敢请客。

1929年冯在南京，别人请客，不是这个饭店，就是那个酒家，行政院长谭延闿在家请客，饭菜尤为考究。当时南京的客人们，都认为北伐完成之后，革命已经成功，大家应该享受享受了。所以当时南京的官员们在吃的方面都十分排场。冯常为此骂大街，说是官僚旧样。有次他在三牌楼办事处请客，吃的是大锅菜。他对客人说：“没有什么好吃的，我来给大家盛上。”结果是被请的人不但不领情，反而说：“哪里是请客，简直是教训人。”

1932年冯赴洛阳，路过开封时，河南省主席刘峙请冯吃饭。有个菜是纸包鸡，别人都是把纸去掉，而冯却连纸一齐吃，惹得人好笑。饭后刘镇华说，冯是故意装相，他不信冯没有吃过纸包鸡（其实冯可能真是没吃过，因为他很少下馆子）。

最后，是冯的住和行的问题。他在住的方面，常常提倡“茅茨土阶，蓬户甕牖”，反对住高楼大厦。他的属下摸清了他的脾气，不论他到哪里，都不能为他预备富丽堂皇的住所，总是找一处比较简朴整洁的房子作为他办公和居住的所在。他在西安的时候，因为不愿把总司令部设在原来的督军署（清朝的行宫，是宫殿式的建筑），另在城东北隅建造了一片房子，叫作“红城”（以

后通称为“新城”)，冯的总部就驻在里面。

至于行的方面，他一贯反对乘坐人力车，认为把人当牛马使唤，是最不讲人道的；但他没有考虑到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大家都不坐人力车，广大的以拉车为生的人就会没饭吃，而且当时还没有能够代替人力车的交通工具，所以他的主张是无法实现的。在他的军队里，只做到了穿军装的不坐人力车（但也有一个例外，他从上海请来一位名医胡兰生，因腿部有毛病，特许乘坐人力车，在他车上插有一面小旗子作为特许的证明），可是大家也有意见，冯老总有时有汽车乘坐，当然不存在坐不坐人力车的问题，只是苦了一般中级以下的官佐们，跑起路来费时又费力。

在1927年至1930年这段时期内，冯往来各地，都有成列的专车供他使用，但他从不乘坐头、二等车和所谓花车，把这些舒适美观的车厢让给他的高级幕僚和作为招待来宾之用，自己总是乘用一节木篷货车。1927年夏北伐军在郑州会师后，武汉政府的谭延闿、汪精卫等到了郑州，冯随后也从潼关来会，谭延闿等在冯的专车到达前，即齐集车站迎候，专车到站时，前来欢迎的人们都走向头等车厢迎冯下车，但他们找不到冯的影子，正在纳闷之际，冯却从后面的木篷货车里走出来说：“我在这里。”有一次他在南京出门拜会政府的要人，本来有专为他预备的小座车，但他却不用，而是坐在一部卡车的前面。

这一些不寻常的举动常常引起人们的议论。有的人说，他之所以要这样做的动机，是为了转移奢侈浮华的社会风气，希冀别人会效法他的做法。但是，在那时，他的转移风气的主观愿望并没有实现。只有极少数人因为受了他的影响，在不同程度上保持了俭朴的生活作风；而有些人则是当面装作艰苦朴素的样子，而背着冯的时候，吃穿享用都很阔绰。如他的运输司令部许襄云在

郑州结婚（冯当时在南京），不但铺张的场面很大，花钱很多，更为突出的是，他竟然敢于派出一列专车开往北京迎接新妇。冯失败下野之后，他的很多将领以为这下子不再受冯老总的约束了，于是在他们中间泛滥着形形色色的腐化生活。冯对于这种情况虽然知之甚悉，但也只有徒叹奈何了。

（吴锡祺 王武九）

亲见冯将军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将军举行反直武装政变，反对吴佩孚，囚禁曹錕，驱逐溥仪出故宫，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国政，为中国的统一与建设举行的革命行动受到人们的敬重。但政权很快落在皖系军阀段祺瑞手中，由于奉系军阀张作霖的进攻，冯将军部宋哲元率军到热河充督统。届时，我父亲姚景川任热河团练，负责地方治安，剿匪颇见成效。宋哲元面见父亲，请他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充混成旅旅长。我当时年幼，记得国民革命军，灰布军衣帽，青天白日旗，约8厘米宽、14厘米长的四方形袖章，蓝地白心，蓝字，上写“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当时的百姓对于鲜明的口号，感到新奇和兴奋。尤其宋哲元部军纪严明，公买公卖，比官匪有天渊之别。处在当时的情况下，我父亲将冯、宋看成是救国救民之师，遂下决心追随，参加了国民革命军。

由于直奉军阀围攻，冯出走苏联，我父亲在冷口、喜峰口与奉军激战，双方伤亡很重，宋部西撤张家口。父亲在大滩亲率所部骑兵何席液池旅、聂玉岭旅一起，与奉军血战三整夜，最后父亲毁家弃产，携全族家小西撤绥远，最后到了包头。父亲的壮举在西北军中引起强烈反响。冯将军从苏联归来在包头听见宋哲元

将军的报告倍受感动，对父亲嘉奖备至。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冯将军。那天下大雪，包头军运频繁，郊区停十几架烂飞机，我还跑到跟前往机舱内看。我和祖父被副官长领到一个大帐篷内，看见一位形似罗汉的人，农民装束，身高一米八以上，穿灰布中式短棉衣、棉裤，白布褂，布操鞋、腰扎宽皮带，短平头，浓眉大眼，脸刮得干干净净，面带笑容，用响亮的河北保定口音，双手握着祖父的手说：“您老人家受惊了，吃苦了！”祖父很激动，眼含欣慰的泪花，感到宽心喜慰。我祖父从外逃以来，第一次有了笑容。冯将军随手拿起一个半斤重的莜麦面馒头给我吃，又拿方块冰糖给我们吃。当时的包头，颇有革命气氛，街上时有工、农、商、学、兵的游行队伍，“打倒军阀”、“打倒列强”的口号声不绝于耳。李大钊的学生杨绍宣、张伯平、俞绍农是当时群众运动的领导者，也是父亲的同学和朋友。西北军西撤五原，他们遭到商震的迫害，被关了起来。父亲当时是绥远督统府总参议，保他们出狱，一直住在家中，这是李大钊在北平被张作霖绞死后的事。这些往事说明冯玉祥将军一贯主张联俄容共。

1931年九一八炮声响，沈阳一夜之间为日军攻占，全国人民义愤填膺，东北、华北各地纷纷组织义勇军。1932年日军三路进攻热河，冯将军命肖振瀛、李忻到天津催促父亲速返热河重建骑兵，义旗所至，乡亲们纷纷来投，不日数千人。同孙殿英部猛攻赤峰，收复数城。1933年冯将军在张垣成立抗日同盟军，父亲充骑兵司令兼第一师师长。我当时在北平高中毕业，目睹国破家亡，决心弃学从军参加抗日。在张垣我第二次见到冯将军。一天午后两点，在南营房操场，父亲领我谒见冯先生，父亲说：“我的第二个儿子也参军了。”冯将军笑了，还拉拉我的手说：“救国嘛！国都没有了，还有什么家，我们要雪国耻！”当时军中有很多北平来的爱国学生，为了国家存亡，不怕吃苦牺牲。当时

抗日同盟军条件很差，六七月还身穿烂棉衣、破皮大衣，吃的一半是莜麦、荞麦。察哈尔本身就比较穷，忽然一下增加了十几万军队，并且当时日伪军已进逼多伦、独石口，蒋介石也派重兵暗中向同盟军围剿。山雨欲来风满楼，形势是严峻的。在我们见到冯将军的当天晚上，放映电影，我同大哥姚明超同去看，操场上坐满了部队，白上衣，灰裤子，光头，齐齐整整。听说这支部队是二十九军留守的一个团，还有山西来的汾阳军校（即西北干部学校）学员。电影放映的是冯将军1930年中原大阅兵，访贫问苦，慰问伤员的纪录片，冯将军亲自为伤员理发的场面十分感人真挚。电影放映间隙，宣传队唱起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歌曲，激昂、热烈，我受到教育，精神上感到很充实。

在张垣时，我见到方振武、吉鸿昌、李发、佟麟阁，李兴中。父亲与吉鸿昌、张凌云部属一度收复多伦，同盟军抗击日军义举得到全国人民的强烈支持。朱子桥捐巨款援军，各地纷纷通电声援，但是蒋介石政府倒行逆施，派周炳勋、关麟徵等部十多万人马从南口向抗日同盟军扑来，一面派熊斌、李忻向冯将军劝说，实际是逼冯下野。冯将军为了顾全大局，主张宋哲元将军回察哈尔主持政局，收编遣散同盟军。当时宋在河北只有两个师番号，不足两万人，因此扩编成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新二师（师长刘汝明），宝昌警备司令姚景川，沽源警备司令张允荣，昌都警备司令高树勋，高走后由张凌云、张德顺接替。阮宣武是沽源副司令，此人是方振武的参谋长。吉鸿昌、方振武率部去河北被中央军击溃。吉逃天津后被特务捕获被害。方振武当时传说已阵亡，后来方知逃往香港。轰轰烈烈的抗日同盟军就这样夭折了。父亲告诉我，住在冯将军住处的那个大鼻子不是苏联人，后来才知道叫柯庆施。汾阳军校的干部学员多数是共产党员，很多人留在二十九军军官教导团，张克侠充教育长。我从军抗日的梦

想破灭了，仍回北平暂在民大读书，雷殷时任校长。

1934年底，我决心到三十八师张自忠部学兵连当兵，后入二十九军军官教导团。1936年日军桂田旅团督蒙军进犯宝昌、沽源，北平爱国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运动，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宋哲元将军已任冀察政务委员会主席，张自忠部进驻天津，肖振瀛任市长；冯治安、赵登禹部进驻北平，秦德纯任北平市市长，佟麟阁在南苑办军官教导团。宋哲元将军屡次召集高级将领会议，再三表决心，加紧扩军备战，与日军最后一战，收复失地以雪国耻。当时已放弃察北六县，我军已撤长城以内，刘汝明是察哈尔主席，父亲骑兵扩充为骑三军，郑大章任军长，父亲任副军长兼骑兵十三旅长，加紧练兵，以应战局转变。我奉命到河北新乡、威县募兵千名，在宣化集训。步兵训练见效快，骑兵能练成上马还容易，而能发挥作战能力就不容易了。所以骑兵扩充很不容易。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军炮轰宛平城，第二十九军三十七师吉星文团奋起抵抗，从此揭开中国全面抗日战争序幕。日首相近卫文馨增兵华北，日军二十师团侵占廊坊，我骑兵十二旅一个团一举收复崇礼县，我大哥姚明超受重伤。7月27日，北平四郊发生激战。28日，南苑被日军攻陷，佟麟阁、赵登禹阵亡，29日，北平、天津相继失守。8月8日，南口战役拉开序幕，第十三军汤恩伯部与日军激战半月有余，最后失守。我部骑兵从长城赤城、尤关，后撤平绥线铁路沿线，程潜任一战区长官，宋哲元副之，实际华北局势很混乱，父亲深感时局严重，收复失地已成泡影，加以祖父在卢沟桥前夕已病故宣化防地，父亲爱国忧民，更忧今后前途渺茫。父亲昔日与宋哲元部、抗日同盟军所部皆已改编为二十九军各师旅团，只有父亲骑兵始终保持独立番号。当时与李守信所部如陈景春、丁其昌、朱恩五、崔兴

五、郭秀珠等师长，皆属父亲旧部，这些人再三表示如果国军大反攻，他们首先起义投诚，共歼日本强盗。这个问题在同盟军时候，陈景春代表李守信就曾来张家口见冯将军，同盟军倒旗，陈也曾几次来张家口，由父亲引见宋哲元将军，也一再表示如果我军反攻，六个骑兵师同时倒戈反正，还几次将日伪军蠢动情报预先通知我方，使我早有准备，并偷运七九步枪子弹两万箱赠给我方，宋将军命父亲赠高级手表 10 只回赠李守信等人。所以二十九军进入河北，父亲仍留在察哈尔，在宋哲元将军扩军备战的统筹计划中，对李守信反正寄予很大希望，这在一次重要高级将领会议中，张克侠参谋处长的作战计划中也着重提到李守信、陈景春反正问题，把这部的兵力用于从热河直攻东北主力。平、津失守，宋哲元将军处境艰难。冯玉祥将军在中央任军委会副委员长，对当时情况也深感不安，1938 年宋哲元将军因病辞职，到四川养病。我部同五十九军张自忠部增援山东临沂，打了场恶战，堵击了日军坂垣师团的进攻，敌我伤亡皆重，刘振三、黄维纲二位师长负伤。我部缴获日军洋马 20 余匹，为台儿庄战役胜利奠定了基础，为徐州保卫战争取了布防时间。否则台儿庄也无法持久以至胜利，因为敌军两路向台儿庄进犯，一路被歼，另一路已失去优势，加以孙连仲、庞炳勋等皆西北军系统，当时韩复榘不战而退，蒋介石在枪毙韩时也曾征求冯将军的意见，冯表示军法从事决不姑息。当时二十九军已扩编成三个军，李宗仁始终把张自忠、冯治安这支部队抓在手。台儿庄战役后，当时张自忠领导的这支部队撤守汉水一线，屡次击溃日军进攻，为重庆大后方的安全起到屏障作用，敌人未能越雷池一步。张自忠将军阵亡，大后方人心震动，悲愤填膺，敌人在汉口、南京开庆祝会，国民政府举行国葬，蒋介石、冯玉祥等国民党中央要员亲临迎祭，全国下半旗致哀，张自忠是抗日民族英雄，是军人的楷模，

冯将军对张的阵亡深感哀痛。

1940年，陈诚提出重新按苏式编制整军。父亲任骑二师师长，历年战役人员马匹伤亡很重，马匹补充困难，训练骑兵非一日之功。屡建战功者，受部队名额局限，该升者不能升，诸如步兵部队当排长的已都当了团长，而骑兵还在待编，由两个师编成一个师，编外军官只好在军官队报到。父亲决心辞去师长职务。

1940年，父亲随同张自忠将军到重庆谒见冯玉祥将军。我当时也辞去团长职务让给其他有功者，冯先生对我们备加慰勉，并亲自到亨得利钟表行选怀表一只，亲笔提字刻于表盖上：“景川将军，一门忠义。冯玉祥赠。”这块怀表一直由我保存，可惜在一空难中损失。为了抗战，冯玉祥将军、李济深将军向蒋介石委员长推荐父亲以军委会热河军事特派名义去西北陕坝成立行署，策反李守信部八个师反正。兄长姚铭超率100人马去了陕坝。冯将军将我留在身边，保送我和梁霭然（鹿钟麟的秘书长）、王维贤（冯先生的亲属，英国剑桥大学毕业，学天文的）到中训团党政班七期受训。也认识了王侔如、赖亚力等。在中训团我们同时参加了国民党和青年团，介绍人我们填了冯玉祥先生。但是在审查梁霭然中提出刁难，认为他有共党嫌疑，后来还是通过了。实际梁霭然、王侔如、赖亚力都是地下党，冯将军对他们倍加信任。鹿钟麟任兵役部长，梁充次长，我们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友谊。我来到后方目睹国民党政府腐败，牢骚满腹，在中训团对孔祥熙子女发国难财，过着骄奢淫侈的生活提出批评，受到教育长王东原的责备，此事冯先生得知后也说我“幼稚”。在保举我去中训团前见冯将军时他曾风趣地说：“去镀镀金嘛，什么教导团，高教班！”中训团是在精减团结抗日到底的幌子下为国民党培养集聚各派势力而设的。中训团毕业后我当军政部部附，又到军官训练班受训为组建军官总队预备干部。冯将军教导我要安心

工作，都是为了抗日，一切从我们做起。1941年父亲病故于宁夏马鸿逵寓所，戎马一生为抗日积劳成疾，未能完成使命，含恨九泉。冯将军非常悲痛，对我慰勉再三，鼓励我努力工作。1943年经冯先生同意，我到航委会空军一大队充政训主任兼中美混合团随军记者，随 B25 飞机轰炸汉口飞机场、黄河铁桥，破坏了日军机场，两个月不能使用，敌人铁路运输瘫痪，这些报道文章登在报纸和《中国的空军》刊物上，鼓舞了士气。抗日胜利后，我被从空军中排挤出来，突然被免去职务。那时正是冯先生与蒋介石矛盾恶化阶段。

(姚名枢)

读《自寿诗》想起的

《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5期上，有父亲《自寿诗》一首，不由想起当年有关这段很有意义的历史。



1926年冯玉祥偕子女在莫斯科谒列宁墓

左起：冯宏志、冯弗伐、冯玉祥

《自寿诗》的标题是《60岁的小伙子》，写于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由于父亲出身赤贫的农民家庭，为了生活，12岁便当了兵，以后经过艰难曲折的道路，虽然位至上将，但仍不失兵民本色，一生恶奢华、喜简朴。正因为这样，所以1941年他在过60岁生日的前两个多月，便在我党于国民

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惟一的报纸《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六十寿辰致朋友的一封信》，信的原文是：

××先生大鉴：

大示收到，多谢多谢。您说还有贺我六十的泥金对联一副，另包挂呈寄赐，对此厚贻，我可不想道谢您！

玉祥年虽六十，而学识才力仍一兵。人生的价值要以对民族国家贡献的多少而定，并不在年岁的大小。玉祥才微识浅，徒负虚名，惭愧之情，与年俱增；您的夸奖，适足使我更加难过而已！真的，我很想哭一场！

实际上，您费神编撰对联，还须研墨写好，还须挂号寄来，而泥金对联又非数十元不办，费时花钱不过为了贺我虚度六十；于我无益，于君有时间金钱的损耗，所以我不想道谢您！

从抗战开始，玉祥既有决定：凡无关于抗战者，不谈、不写、不做。我的生日于抗战无关，您虽善意，而我如坐针毡。即在平时，我们公务人员亦应革除酒肉应酬、按时送礼之陋习；抗战期间怎好还注意这些小节而浪费光阴与金钱？我的话系出自肺腑，绝非矫情，我深信您必能明白我，原谅我！尊此，敬祝

时祺

冯玉祥^①

尽管父亲有言在先，谢绝祝寿，但是各方人士出于对他的革命精神和爱国热忱的尊敬，仍然对他的60寿辰表示了隆重的庆贺。特别是《新华日报》于11月13日寿辰前日，以《庆祝焕章将军六十大寿》的醒目标题，辟出整版发表了各方贺电祝文，父

^① 见《新华日报》1941年8月28日第二版。

亲的自寿诗《60岁的小伙子》做为头条刊登在右上方，正中间还有他的一幅木刻像。最让父亲感动的是毛泽东主席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从延安给他发来的贺电，以及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副主席亲笔命题和署名的祝文。现将这些宝贵的史料抄录于下：

焕章将军勋鉴：

欣逢先生六秩诞辰，泽东等山河睽隔，未能跻堂为寿，良深歉仄。兹特肃电奉贺，用当华祝，词虽俭平寸楮，情实殷于三多，希垂察是幸。引领

霄云，毋任忭颂。

毛泽东 林祖涵 吴玉章
陈绍禹 秦邦宪同叩佳

南山峨峨，生者百岁；
天风浪浪，饮之太和。

集司空表圣诗品 恭祝
焕章将军六秩大庆。

朱德 彭德怀

上将勋名日月高，时危草野起英豪。
龙争虎斗风云会，豕突狼奔海宇骚。
力赞中枢抗强寇，性耿佳句弄柔毫。
吟诗寿世原余事，语妙并州快剪刀。

董必武敬祝

真体内充，返虚入浑
生气远出，与古为新

集司空表圣诗品 共祝
焕章将军六秩大庆

叶剑英 李克农敬祝

写诗写文章，亦庄亦谐如口出；

我所知道的冯玉祥

反帝反封建，不挠不屈见襟期。

邓颖超敬祝

当代老青年，所向无前，怪力乱神齐辟易
论坛新宿将，其来有自，嬉笑怒骂皆文章

吴克坚敬祝

民国宿将，大众诗翁。位尊而关心民疾，身老而益奋壮
猷。逢花甲之寿辰，为民族所共庆。

钱之光敬祝

为民族存正气，是抗战之前驱。

徐冰 张晓梅敬祝

周恩来副主席寿冯焕章《先生六十大庆》的文章，更是系统全面地对父亲的多半生政治生涯做了高度的评价，当我们读到这篇文章时，联想到总理他老人家对我们一家始终不渝的关怀，禁不住热泪夺眶而出。我们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抄下这篇全文：

焕章先生 60 岁，中华民国 30 年。单就这 30 年说，先生的丰功伟业，已举世闻名。自滦州起义起，中经反对帝制，讨伐张勋，推翻贿选，首都革命，五原誓师，参加北伐，直至张垣抗战，坚持御侮，一再表现出先生的革命精神。其中，尤以杀李彦青^①，赶走溥仪，骂汪精卫，反对投降，呼吁团结，致力联苏，更为人所不敢为，说人所不敢说。这正是先生的伟大处，这正是先生的成功处。

先生善练兵，至今谈兵的人多推崇先生。五原誓师后，又加以政治训练，西北军遂成为当时之雄。先生好读书，不仅泰山隐居时如此，即在治军作战之时，亦多手不释卷，在现在更是好学不倦，永值得我们效法。丘八诗体为先生所

^① 李彦青系军阀吴佩孚手下的人，曾杀害两名爱国记者，为吴包庇下来。

偈，兴会所至，嬉笑怒骂，都成文章。先生长于演说，凡有集会，有先生到，必满座，有先生讲话，没有不终场而去的。对朋友对同事，尤其对领袖，先生肯作谏言，这是人所难能的。先生生活，一向习于勤俭朴素，有人以为过，我以为果能人人如此，官场中何致如今日之奢靡不振？！先生最喜接近大兵和老百姓，也最懂得军民合作之利，这是今日抗战所必需。先生不得志时，从未灰过心，丧过志，在困难时，从未失去过前途，所以先生能始终献身于民族国家事业，奋斗不懈，屹然成为抗战中的中流砥柱。

先生的德功，决不仅此，我只就现时所感到的写出。先生今届60，犹自称为小伙子，而先生的体魄，亦实称得起老少年。国家今日，尚需要先生宏济艰难，为民请命，为国效劳，以先生的革命精神，定能成此伟大事业，不负天下之望。趁此良辰，谨祝先生坚持抗战成功，前途进步无量！^①

这样的祝寿词文，父亲看了禁不住热泪盈眶，深受鼓舞和鞭策。因为当时他虽名义上是副委员长，地位仅次于蒋介石，但由于他坚主联共抗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所以蒋介石对他耿耿于怀、恨之人骨，时时处处派人严密监视他、防范他，使他不能过问国事。在那形同幽囚的处境中，中共领导人对他如此高的评价和所寄予的殷切希望，怎能使他不感动唏嘘呢！父亲所以能从一个典型的旧军人逐步走向一心一意为人民的革命道路，固然是由于他自己的主观努力，但主要的还是中国共产党对他的帮助和影响所致。

这一天的《新华日报》，父亲郑重地把它珍藏起来，至今仍保存在他遗留的文物之中。

^① 见《新华日报》1941年11月13日第一版。

父亲的60寿辰，还有一段避寿的佳话流传。11月14日生日这天，家里的宾客仍是终日不绝，简单朴素的厅堂中，满悬各方友好的祝词和诗文，有数百天真儿童祝寿的画幅，也有远自香港等地寄来的诗篇，琳琅满目，充满了对父亲的爱戴之情。这天接待客人的，是父亲的几个旧部，寿翁夫妇却始终不见露面，他们跑到哪里去了呢？原来，他们头天便躲到成渝公路上的一个小镇——丁家坳去了。

说来也很有意思。12日这天中午时分，丁家坳大街小巷就传开了“冯将军来了”的消息。果然，下午5时左右，父亲在九江同文中学校长的陪伴下，迎着夕阳的光辉在大街上和老百姓碰头了。

“……看大伟人……”

“……看副委员长……”

“小罗：……快……快点来看冯玉祥！”

大人，小孩，男人、女人，怀着崇敬而喜悦的心情，依依不舍地跟随在父亲身后左右，途为之塞。父亲也高兴得忙不迭地和大家打招呼问好。

晚上，虽然父亲再三坚辞，同文中学的学生们还是开了一个晚会，为父亲祝寿，以60个柑子、几把面做为寿礼，父亲盛情难却，只好收下。“60岁的小伙子”在大家的欢迎下起立致词了，他从“怎么能说是寿”，直说到泰山隐居。父亲神采奕奕，语句幽默，特别是末了还来了个独唱的山东民歌，会场气氛更为热烈活跃。

第二天，感于大家的热情，父亲掏了腰包，招待同文中学几百学生每人吃半斤面，以资答谢！

早饭后，父亲的车悄悄地驶出了丁家坳。可是到了午饭后，街头巷尾又哄传着“冯将军又转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原来，父亲在途中碰到三个挑柴的小孩子，正因为挑不动坐在路边呜呜

地哭。父亲急令停车，让三个孩子坐进车里，把柴草塞进车屁股后面，亲自又把他们送回了家，下车时还给他们拍了照。

“没有官僚的派头，简直还是老百姓！”事后丁家坳的人都这样谈论着。

生日过后，父亲为了感谢各界的敬贺，特地写了一首《谢寿》诗，发表在《新华日报》上。原词是：

谢谢我的长者先生们，
再谢谢我的老少朋友们，
因为我 60 岁的生辰，
用了百般的方法，
使人惭愧，
使我兴奋，
我不但得着了許多激励，
并且得了你们很好的教训，
我对国家没有作成什么，
我对本分没尽到了什么，
这是教我努力前进，
这是为了鼓励别人。
我这嘴实在不会说述，
我的笔实在不会抒陈，
我就是再说再写，
也不能形容出我的谢忱，
我只有在今天立一个最大的决心，
做一个崭新的青年人，
向着真理不断地迈进，
为了我们的国家民族，
为了全国同胞和全世界的人群，

努力不懈不怕牺牲，
尽自己的本分打倒侵略的敌人。
我就拿这一点感挚的心情，
来感谢我的读者和朋友们。^①

这已经是近40年前的事了。1946年，父亲愤于蒋介石阴谋挑起内战，离国赴美。他在美两年，不顾年高，奔走呼号，在美国的本土上，抱定牺牲的决心，英勇地展开了反对美国援蒋，反蒋独裁卖国、大启内战的斗争，写下了生命史上最光辉的一页。1948年，他为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毅然决然离美经苏联回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毛主席和周总理对父亲的回国事宜极为关心，曾指示东北局财政负责人钱之光同志，携专款雇了苏联从德国手中俘获的客轮“波贝达”号，接父亲回国。7月31日，父亲冲破了美蒋特务的重重监视包围，带着我们一家从纽约登轮启程。当时父亲的心情是何等兴奋愉快呵！因为他终于踏上了他久已向往的解放区的归途，他清楚地看到，他一生为之追求奋斗的独立、富强的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即将诞生了。可是万万不料，9月1日“波贝达”行至黑海时，突然起火，来势凶猛，顷刻之间，大火吞噬了父亲和姐姐晓达的生命。亲爱的父亲就这样骤然与世长辞了。

读到父亲当年的《自寿诗》，感慨多生，不由提起笔来，写下与《自寿诗》有关的往事，以此做为我们对父亲的无限缅怀！

（冯洪达 余华心）

^① 见《新华日报》1941年11月20日第二版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我所知道的冯玉祥

作者 =

页数 = 269

SS号 = 0

出版日期 =

抗日战争图书馆
www.krzzzjh.com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第一章 在祖国的大地上
开封除旧布新
建设新河南
晓庄创办教育
避居峪道河
东游胶东
视察临汝
贵阳买灯盏
重庆砭时弊
威远献金
江津募捐抗日
重用知识分子
合江亲见
四川讲演

第二章 治军能手
立志从严治军
视军队为生命
给帽子敬礼
恩威并施带兵
爱兵如子
奋斗的一生

第三章 与将军相处的日子
风雨十年
幕僚所见
麾下十一年
常德亲见
体察民情
孜孜不倦读书
我的求学记
“平民将军”的生活
亲见冯将军
读《自寿诗》想起的

附录页